

新聞事業與社會組織

北新書局

一九二七年五月初版  
一九二七年六月再版

新闡事業與社會組織

著者 英國安傑爾

翻譯者 張友松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北京東皇城根  
上海四馬路

實價三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序言

這本書的前面一部分是就新聞業與社會的普通關係討論討論；無論那一種社會，如果要避免道德的漸漸降落，要越來越增加牠的自治能力，成爲有價值的社會，便有種種問題必須應付，必須解決，本書所討論的問題也就是其中之一。

後面的一部分討論這個問題，是特別以勞工運動的眼光來討論，如果工黨政府出來執政的時候，牠所要應付的種種特別難題之中，這就是一種。這書的後面一部分包含着幾種具體的提議，其中所擬的辦法都是一個比較我們現在所組成的社會更社會化的社會關於新聞業問題可以採用的。

我說『社會化的』而不說『社會主義的』，爲的是不願出了這本小書的範圍來討論各種關於政治或經濟改造的互相衝突的理論或學說，或是嚴格的依照任何一種社會主義

的原則討論社會進化的問題——無論是國家社會主義，幾爾特社會主義，改良派社會主義，革命的社會主義，議會制的社會主義，或是共產的社會主義。作者在這裏關於未來的發展所假定的只有兩點：第一，人類越明瞭他們那些社會的危機，他們便將要越加團結的努力，力求支配社會實力以達避免那些危機的目的；其次呢，工人勢力的比較增加，譬如我們那有組織的勞工運動的勢力之增加，必是由於勞工努力將經濟的勢力從資本家轉移到工人自身的結果。所謂「自治」除此以外便沒有多少意義了。

這兩種假定都是認為我們對於新聞業切不可專持那商業性質的一味圖利的態度。

現在大家的見解都認為所謂「公家的言論機關」是一種公家的事業，這種社會勢力也許要成爲一種社會的危機，須要大家自覺的聯合起來管理纔行。要實現這種聯合的管理，却不可仍舊回復當初那種政府檢查的辦法，這也就是本書所討論的問題之一。至於第二點關於勞工運動的將來所設的假定呢，工人要想取得議會中的勢力，只要把新

聞業完全壟斷少數大資本家動手製成足以使政府重新得到鉅額利益爲目的；對新新聞

是應由管理新聞業的人一手經辦的，大家決定他們對於各種問題的意見和政策，便是根據他們從新聞方面得來的知識，這種工具若是全留在少數資本家手中，他們是和其他的資本家緊緊的互相結合的，勞工怎麼能不為他們所制呢？若是那樣，工人取得了政治勢力，纔知道真正支配社會（包括政治）的勢力原來還在政治之外。勞工雖然可以組成政府，但是結果必是造成政府和打倒政府的勢力終究還是在勞工階級以外的人手中。勞工越想應付這種局面，便非有種種努力不可，本書後半所論的便是這一點。

讀這本書的人只要是沒有偏見，或是肯加思索，一定不會認為作者的用意是要攻擊新聞事業或是攻擊某某辦報的人。（本書作者正是作過二十年的記者和報館經理的。）下文是要說明新聞記者和報館主人雖則都願意完全獨立，却都受着幾種外力的支配；這些外力常使報紙起一種作惡的反社會的作用。書中那些具體提議的目的便是在於改良那種情形，並且在這一方面提高一般從事新聞業的人的地位。

# 目錄

## 序言

第一章	根本問題·····	一
第二章	新聞事業與民衆心理·····	一二
第三章	新聞事業與舊社會制度·····	四五
第四章	資本主義，平民主義與新聞事業·····	六三
第五章	現今制度之下可以實現的改良方法·····	八九
第六章	勞工政府與資本主義的新聞業·····	一〇八
第七章	工人如何纔能取得辦報的地位·····	一一六

# 新聞事業與社會組織

## 第一章 根本問題

在一種社會化的社會制度之下，國家之管有街道，暗溝，道路，橋梁，鐵路，煤氣，電氣，鑛產，土地或資本，究竟應該取什麼方式，到什麼程度，這是討論一種進步的社會組織的時候所常談到的。但是適用於討論那些問題的時候的見解，對於一個人口稠密的工業化的社會裏的新聞業問題，却大部分不能適用。國家與新聞紙的主要關係不在於直接意義的經濟作用，換句話說，就是不在於新聞紙是一種產業或生『財』的工具——這都是次要的。社會上的人之得着種種事情的消息來決定社會全體對於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方針，事實上便全靠新聞紙為惟一的工具，這個問題的重要便在這點。報紙便是社會上一切事情的公證人，現今進化的人類日常的判斷大體就是以牠

爲根據。在現今這種社會裏，大家的見聞遍及全世界——在這種非常發達的社會裏，公衆的意見關係極大，譬如在得里都布林和柏林這等地方，地道電車裏和公事房裏茶館裏那些只看一看報紙上的提綱的忙碌無暇的人們急急忙忙所下的判斷便等於決定或和或戰那類大事的法律——在這種社會裏，新聞業縱或不是社會的講經台和裁判所，也可說是牠的耳目，尤其是逢着危急的時候。

這一種產業的問題和其他各種之不同，便是因爲牠最近的歷史上有一種特點。關於道路，橋梁，水，電報這些事情，都顯然有一種社會的需要表明牠們定要一步一步的漸漸歸國家所有；這種方向是從私人管理變爲公家管理。關於流傳印刷文字的新聞紙呢，社會的需要正向一種相反的趨勢：從公家管理——國家支配——變爲私人的自由（註）。我們的祖先力爭新聞業的解放，擺脫國家的管理，這是爭自由的奮鬥中很顯著的一部分。我們的祖先認爲只要不受卅制，能出充量的廉價報紙，便是普通的自由和啟發知識的法門；現在我們知道這種「自由的言論機關」已經成了發展自治能力的許



多最大障礙之一，甚至於是現代民治的危機之中最大的一種——這便是純粹政治的民治精神的覺悟之一。舊社會所認為革命的工具和牠所最怕的東西事實上已經變成妨碍任何趨向新社會組織的實際運動的最大阻力了。

(註)一六六二年的新聞律那類東西自十八世紀的初年以後雖則已經不見實行，政府管理的痕跡却一直在一八五三年取消新聞紙稅和廣告稅和一八六一年取消報紙印花稅之後纔算沒有了。早年限制新聞紙勢力的方法是實行『官准出版憑照』和給予專辦權的辦法。克倫威爾的時代新聞界所受的痛苦較之『星法院』(Star-Chamber, 英王查理士第一時代取消的，以殘暴著名。)的時代還要厲害，但是最厲害的時期要算『復位政府』時代，那時候專門以揭發『誹謗和邪說』爲事的羅傑·黎士帝治氏受了政府的特任，作新聞紙檢查官。當時官家的態度很可以拿這位先生有一次所發表的意見代表出來。他說：『我大胆的說……即令新聞界能守規矩，人民的頭腦也清楚，肯問一問哪是新聞哪不是新聞，我對於這種事業也還是不贊成的，因為有新

聞紙便使人民對於官家的行動和主張太熟習，太愛管事，太愛批評，這不但使他們起一種干與政府的事物的慾望，而且還使他們覺得有一種似是而非的權利，認為可以任意干與的。」

作者將新聞業的歷史上這種最近的趨勢提醒讀者，爲的是要馬上就談到這個問題裏面的根本論點。「收歸國有」這種原則，即令拿幾爾特社會主義自治的原則來限制牠，也不能像這種原則之適用於礦產和鐵路一般的適用於新聞業。其所以不能適用的原因，正是這個問題的中心。

那種原因便是在於人心的問題；因爲人心是極易犯錯誤的，牠若是要保持正確判斷的充分能力，還絕對的須要反對的批評和相抵觸的討論；而新聞紙的功用對於這點都是很有關係的。如果說一國的人民應該站在判斷他們政府的行爲的地位，來判定政府的舉措是否應當，判定公家的政策的價值；那麼，他們若要保持正確判斷的能力，他們必須得到一切事情的真相，關於種種問題的消息不僅要隨政府的意思發表出

來，而且還要隨反對政府的人的意思發表出來，給他們看。換句話說，言論自由這根本問題是新聞真確的必要條件，新聞業的問題——牠在社會上的地位和牠的管理權——便和這個根本問題有直接的關係；所有的政府，所有的人民，都需要別方面的批評，一般的意見若沒有不普遍的意見來糾正牠——那就是說，若沒有為政府和一般人民所常願意制止的那些非平常的新見解來糾正牠——終歸還是要漸漸的降落牠的價值，自治的能力也就要因此衰敗了。

現今這種工業化的新聞業是不能負剛纔所說這種使命的，並且還越來越不成話；這是實在的情形，本書也打算要說一說的。但是我們要想改良新聞業若是仍舊恢復以前那些辦法當中的任何一種，那就簡直是由壞的情形一改而為更壞了。

我們所怕的是一不留神，又造成一種新的檢查法，讓政府藉著公家管理新聞業的權造成一個政治和社會的「宗教法庭」，這種危險，只要看大戰時新聞界的經驗和我們那些「宣傳學校」對於政治作用所得到的結果，便可以明白。這種檢查法之最惹人注目

的當然是英國之施行「治安法令」和美國之施行「偵察條例」了。我們英國方面實行取締新聞紙和控訴羅素他們這一類人，並不是因為他們洩露了什麼可以為敵人利用的消息，而是因為發表了「大致不利於招兵」的意見。耶穌登山訓衆的訓誡（The Sermon on the Mount），也是足以妨礙招兵的，有一位次長便說，這些佈道的話如果是有人用來發生這種作用，那也是要取締的。當時有許多種的報章（國民雜誌便包括在內）禁止在國外銷行。像狄更生這一等作家的著作也是同在禁止之列的。（軍事當局對於這些事情的心理之奧妙真是不可思議啊！）政府挨戶的搜查人民為的是要與文字之獄。總而言之，我們當初將帝國主義的普魯士和帝制時代的俄國罵了多年的事情，到了這時候沒有一件不是英國法律之下所能作出來的。美國呢，當然是更不消說（註）。這些卅制輿論的事情是到處都述得很詳盡的。

（註）按一九一八年「偵察條例」修正案的規定，「凡有在美國參戰期內故意對於美國的政治，或憲法……或海陸軍隊……或美國旗發表任何不忠心，不敬，無禮，或辱

罵的言詞的，無論是口說，印刷，書寫，或披露出來，都處以一萬金元之罰款，或二十年的監禁，或同時加以這兩種處罰……又凡有人發表任何言論，意在輕蔑，侮慢，凌辱，或誹謗美國政體……或國旗……或軍服……或主張作禁例以內的任何行為或事情的，亦加以同等處罰。」我們看一看關於戰事控訴案件和驅逐出境以及驅出立法機關等等事實的驚人的記載，便可以看出美國人那種全國的自由理想在美國法庭裏和立法機關裏所得到的地位是何等的不穩固了。假使美國人真有以自由為原則的感覺，得布士君也就不致於為了一次反對一般的戰爭和稱贊羅斯·巴司托，斯多克士的演說而被定罪。（斯多克士也是為了一次同樣的演說被判有反對草定條例的罪名；但是她的信心後來完全改變了。）羣衆雜誌也不致於為了有些反對戰爭和稱贊瑪·哥得滿和馬利山大·伯克滿為「美國自由之友」的諷刺畫，便被禁止郵寄。偶爾的侮辱和激烈言論，若不是因為當局特別認真的拮据民意，當然是不要緊，不致受處分的。紐漢蒲夏前裁判所長杜君的兒子在一封信裏面說，總統說德國答應了對於中立

國停止海軍作戰，這話是錯的，因為德國通牒並沒有應允這一點，這本是不算什麼，若不是政府特別拮据民意，也是不致於得罪的。有一個出電影片的人爲了撮演一種叫做「一七七六年的精神」的影片，描寫美國革命時的光景，法官認爲足以使我們英國人對於美國寒心，便將他判了十年徒刑，並且使他不得不破產，若不是因爲政府拮据民意，也不致於如此。布拉吉特君也不致於爲了主張取消一個贊成徵兵的議員和散佈一種理由書反對「草定條例」有憲法效力，便被判二十年的徒刑。

但是這些拮据輿論的辦法雖則可恨，並且常是不免太無聊，究竟牠們是否足以代表恢復政府管理輿論的最壞一方面，却還是成問題。這些情形至少還可以看得見，可以攻擊，如有人向法院控訴，法庭還是不能不依法律公平處理。國人對於政府的行爲和牠所允許的事情是怎樣，多少還可以看得出來。最壞的是各交戰國都以政府的宣傳作爲政府的一部分，這種辦法比較的更不明顯，更危險得多了。設立政府出版局和利用新聞界作政府宣傳的主要工具，都是各個交戰國所通行的辦法。凡是肯稍微留心的

人便可以看出牠們的新聞紙裏面每間一欄便有宣傳的痕跡。不知其中底細的讀者普通拿當毫無攙雜的「新聞」，事實上常是別有用心某外國（或本國）政府所設的「訪問部」爲了軍事或政治的作用而製造出來的一面之辭。當時在幾個月的工夫之中我們使極力的將新聞事業弄成了一種「下賤」的東西，較之畢士麥所希望要造成的還要糟，這種情形在英國和美國也和在德國是一樣的。這句話固然已經是很有力量，但是我們只要讀一讀那些新聞記者和戰時通信員在戰後所發表的紀載，只要研究研究瓦爾特·黎甫滿君在他的「新聞之化驗」（註）裏面分析新聞的那一類文字，便不能不承認這話實在是當時的真象了。

（註）新聞之化驗是一九二〇年八月四日的新共和國一書的補編。

但是我們若認爲這種錯誤完全應該歸咎政府，那我們便放過了這種毛病當中的一種主要原因了。要知道歐戰時輿論之受抵制，（其實有些事情便在和平時期也不免受抵制，）最厲害的不是政府之抵制，而是他方面的。起初是幾種利害關係來抵制，並且也

是民衆自己抵制自己，其危險是一樣的。若是西部歐洲和美洲的新聞界全部都大家異口同聲的假造俄國方面的消息，（如黎甫滿君所說的，美國某種最著名的新聞紙便是這樣）；若是新聞界永不說一件真正可靠的事情；若是關於罷工事件和勞工運動也老是這樣的顛倒是非，那當然並不能十分歸咎於政府之抵制輿論了。一部分是由於現在所出的這一般的報紙所不能重視的幾種利害關係的影響。但是一方面也是由於讀者自身的毛病，換言之，就是由於『民意』的毛病，這一點也許關係還要更大哩。所謂『民意』多半無非是由新聞紙造出來的，這話當然不錯，但是現在的新聞紙之製造民意，不過是利用一般人種種的傾向和本能的衝動罷了。

出版事業由公家管理的真正危險（關於這個問題，本書中還要從幾方面討論的），便在於人的本性是恨惡討論自由的，那就是說，恨惡別人發表我們所不贊成並且足以攪亂我們的信心的意見。自由討論和聽我們所認為錯誤的罪惡的危險的不道德的意見，實在是一種非常令人不快和非常困難的社會訓練，但是我們如果要保持一種足以維繫



我們這複雜社會的民衆判斷力，便非受一番這種訓練不可。我們大家都有一種共同的本性，誰若是膽敢和我們意見不合，我們便覺得無可容忍，非壓迫他申斥他不可，公家管理言論的原則之危險便在於使我們這種本性得到一個發洩的機會。今天這種原則可以被一般愛國主義的多數人拿來攻擊親德派或是赤黨。明天便可以給社會主義者拿來攻擊中產階級，再過一天又可以給某一派的社會主義者拿來攻擊別一派的社會主義者——並且不消說大家都是以「國家的需要」爲理由的。歸根說起來，還是因爲我們有那種歷代相沿的心理，恨惡異說，恨惡不與我們相同的意見罷了。

現在這種資本主義的新聞紙實際上是不能保障自由討論的，並且還很足以發生相反的影響：這是不成問題的，前面已經說過；其原因下面便要更詳細的說明。但是既然如此，我們若認爲私人辦的報紙不是解決的方法，認爲社會主義的社會一定不可由國家管理新聞業，此外的辦法是怎樣的呢？

本書的目的便是對於上面這個問題提出幾種答案。

但是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工業化的新聞紙，究竟長處在那裏，毛病又在那裏呢？牠爲什麼是社會改造的對敵呢？我們以後要改良，所不得不遇到不得不對付的勢力又是什麼性質呢？關於這幾點，我們必需先得一點清楚的觀念纔行。

## 第二章 新聞事業與民衆心理

我們反對現在這種情形的二十世紀的新聞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這樣：——  
現在這種社會文明越來越複雜，越來越難於應付，不僅需要智力標準的增高，而且還要品格標準的增高——人們要能將那幾種不經訓練便會成爲反社會的破壞性的天性加以訓練纔行——在這種狀況之下，新聞紙却因爲有幾種利益是牠們存在的條件，便不得不爲了這些利益越來迎合讀者們那些最易引起的興趣；不得不極力的利用那些最易於激動的天性和情感，只求大家「一度」過想而不求他們「再度」的考慮，

至於這樣造出來的趨向和習氣對於社會上究竟發生什麼影響，他們却不管了。要知道最易於引起的情感多半都是最反社會的，而與「再度思想」相反的「直覺」便多半是一種偏見，所以新聞紙爭相迎合一般人心理的結果便使大家的想像力和判斷力都越來越降落；使大家不能適得其當的決定一切事情。而我們要想改造社會，却是非靠大家有這種能力不可的。

現代的新聞紙其他的各種危險都是附屬於這種最大的危險的。新聞紙多半為叢種政治的和經濟的利害關係所驅使，作了有組織的資本和登廣告的人的奴隸。這些事實是馬上就要論到的。但是新聞紙之供那些利害關係的驅使，當然只有藉某種普通的方法影響一般人的心理。我們如果要談到如何應付這種情形的種種危險，要提議各種的辦法，便非先對於新聞紙影響一般人心理的方法稍微明白牠的內容不可。

同時還有一點，我們必需拿當為不成問題的道理，關於這點，如果要詳細說明，一定不是這本小書裡所能辦到。這點是什麼呢？便是：任何社會都要靠「普通的公意」，

這種普通的公意大致都是盲從的，民衆的氣性便包括在內。這種定則大家都承認是當然的，幾乎成爲一種自明之理了。但是牠的意義却很少有人完全了解。一般政治家似乎是最不明白這裡面的意義，其實他們那種行業的原料終究還是民衆心理。在最近十年之中我們便看見過許多政治家一面對於那些顯然威脅他們的國家和威脅全世界文化的災禍很希望避免，並且他們的希望也許還很真心，但是他們却又鼓吹許多足以使那些災禍成爲必不可免的觀念或主張；爲的便是這些觀念或主張可以暫時的幫助他們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譬如吧，我們便知道有些政治家，明明是深知大戰告終後若再循從前的成例定出解決的辦法，結果還是不免再起新的戰爭，西方文明從此便要壽終正寢，但是他們却故意鼓吹「反德奧主義」，大家有了這種觀念，當然就除了產生從前那種解決辦法而外別無他道了。他們的態度好像是不承認戰後解決辦法的性質如何是要由一般人的觀念決定似的。他們好像是相信那些「外交專家」可以將那種普通的心理置之不顧，或是相信他們會要不顧似的。

關於種種的政策問題，新聞紙所發生的「影響」常被否認。譬如吧，我們可以指出幾次選舉的經過，「所有的各報都幫着一邊，而所有的選舉票却都是投的另一邊。」但是這種的例子與那商業化的新聞紙對於民衆心理和性格的根本影響這個問題實在不是有關係的。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九年中間的幾年，一般人的心理都是非常急性的，毫無自主之力，或者稍微有人加以暗示，便成這種狀態，這幾年之中的歷史便可以使我們知道一家報館的主人在感情作用正盛的時候能發生多大的影響。在我們英國有一種最大的勢力是不受憲法支配的，這種情形無論我們是否願意，事實却是如此，至少逢着緊急的時候是如此的。有幾位辦報的人物——如北岩，哈爾敦，畢裴布魯克，巴東賴——正是到了那幾次緊急的時候，便有管理英國和「英國成爲今日之英國」的勢力，下議院或內閣，教會或工聯，都不及他們。我們尋求近年來勢力轉移之經過的時候，便每每說到下院的衰落，行政方面勢力增長，內閣的專制，和魯意·喬治之專權。不過

我們要知道那些緊急的時候將那專政的勢力給魯意·喬治的是什麼，就事實而論，決定這個內閣應該推翻那個內閣應該造成的勢力又是什麼。

但是新聞業的勢力之大並不能單看一個北岩爵士或是一個巴東賴能夠怎樣的譏評這個政治家或是頌揚那個政治家而判定。有人常說，「新聞業托辣斯」的勢力在表面上看來是很大的，實際上却並不見得怎樣；牠的職務便是費點腦力，預料各種事情將要發生什麼結果——如對德宣戰，徵兵，和諸如此類的事情——從事鼓吹，然後發生了效力的時候，便享有那種名譽；牠的影響是全靠忠實的反映民衆的意見，所以牠既不能領導民意，也不能支配民意；牠不過是像一個氣壓表似的，記載記載天氣罷了，並不能決定天氣的。這是一種的見解，當然也稍有可信之點。有些人却說要維持或造成和平局面，要定出較好的戰後解決辦法，要救濟災區難民，或其他等等的東西，惟一的辦法只有「說轉北岩爵士的心」；持這種見解的人是代表和上面那種說法相反的一派的。他們認為只要北岩願意，若干年來人類的希望便終歸可以實現了。

這兩種見解都抹煞了事實方面的重要之點。譬如第一種見解吧——認爲北岩爵士他們這一類人的勢力實際上並不算什麼了不得——十分費力的鼓吹這種意見的人，大致都是因爲他們對於政治的和公衆的事情所持的信心大部分正是由他們所輕視的那種勢力決定的。我們時常聽見許多英國的家主談到那些辦報的人和他們那些無價值的駭人聽聞的話，便表示非常輕視的神氣，你若說他們的意見要受那些人和那些話的影響，他們簡直就老大的不高興；但是仔細考究起來，跑到他們家裡去的印刷品，凡是他們拿來看的，事實上便沒有一件不是從他們所輕視的那個來源來的。不過他們總是說，「但是我的意見並不是從報紙上得來的；報紙上那些論文我從來就沒有讀過。」你若引着他們往下說，使他們對於現今的政府發表他們的意見，讓他們說一說政府的長處和短處，說一說他們對於政府裡面那些人物的批評，說一說他們對於別的國家的特點所持的見解，說一說他們對於國家財政政策，國家教育問題，和本國已往的和將來的外交政策所存的觀念，以及其他等等，你便可以發見他們所表示的意見樣樣都恰

恰與我們現在這些報紙裡面的口吻相符合，而這種口吻又正是代表北岩的報紙的。他們這些人看見了那些報紙上的新聞，便以為是事實，他們的意見當然也就不會不是這樣了；那些事情，都是北岩爵士認為他們應該得到怎樣的消息便給他們怎樣的消息——

一部分的事實一天一天的加重，另一部分的事實呢，雖然根本上是同等的重，却被藏在犄角上去了。本書作者曾經試過好幾個這一類的家主，考驗他們對於某種重要事情的知識：我問他們，知道某某外國政府的某種行動嗎，知道議會裡某種報告嗎；知道政府某種正式調查的結果嗎？他們是不知道的；因為辦報的人不會打算使他們知道。他們對於某某在政府裡服務的人所下的批評，便是因為看了有意攻擊那個人的新聞記者們在議會裡的演說詞篇首和每段前面所加的總括的話；至於他們心中存着那些模糊的印象，覺得另外某人是前途大有希望的，那實在是因為他們聽見他們的老婆和女兒時常談到那個人。而她們又為什麼時常談到那個人呢？那就是因為家庭解

週刊 (Weekly Home Comforter) 上時常畫着那個人的妻怪親愛的抱着她的小孩。這



樣一來，除了報紙上那種顯然的鼓吹而外，還可以加上這種不露痕跡的「捧場」作用，以達政治的目的，豈不妙哉！

由此看來，全英國的輿論大致都是為極少數人所支配，而他們之支配全國輿論，並不是靠着直接發表他們自己的意見，而是靠着發表新聞的時候斟酌輕重；對於一部分的事實特別加重，同時把另一部分的事實丟在後面，這樣一來，大家當然非得到某種的結論不可了。明白了這點，便可以知道人家說北岩爵士事實上支配着全國人的心和意見，說他可以靠這種手段指揮國家的政策和命運，實在有理（註）。

（註）我們不要忘記了，在選擇新聞材料供給讀者這一點而論，除新聞紙而外還有比牠們幾乎更重要的大通訊社——如英國的路透社，電報流通社，中央通訊社，外國的合作通信社，聯合通信社，哈華社等等。英國和外國的通信機關之間，都有互相關連的合作辦法；如哈華社與合作通信社合作，合作社又與路透社合作，其餘可以類推。一種報紙至多不過是給若干萬人看，而這些通信機關的消息却是給若干百

萬人看的。有些關乎政策的事情，譬如西方各國與俄國的關係這個問題，由這些通信機關發出去的新聞稿簡直就可以有支配的能力。

管有報紙的人自己就是這些通訊社的股東之中的主要分子，譬如合作通訊社便是一種合作的營業，由牠供給新聞稿的那些報紙便是牠的主人翁。（參看第四章第六七頁的註）

這種勢力在某幾種情形之下固然不消說是很危險的，但是現在使我們難於應付的，這還不能算是最危險的一點。因為這種勢力究竟還是很有一定的限制；我們正是要明白這些限制的性質，纔可以尋出那更大的危險之所在。

現在我們先看一個新聞業組合對於和戰問題的力量是如何的有限。我們爲說明起見，假設英國爲根本解決國際間再起競爭，決意取徹底的手段起見，曾定下一種可行的計劃，擔保德國在世界上那些未曾開發的區域——如埃及，摩洛哥，和非洲其餘的地方——有經濟上的真正機會平等，並且擔保它在近東有經濟上的「自由通過權」——

假設如此辦法，便可以將近十年或十五年以來的德國軍國主義之發展制止，使自由和國際主義的趨勢發展。假設這種計劃的範圍非常之廣，德國全國的人見了便明白他們的經濟利益決不受「圍困」或威脅，明白其他各大民族並不將他們排除於機會平等之外；假設英國準備着將它那帝國統轄的領土加一番國際化，並且預備藉它的影響使法國也在它的殖民地內應用類似的政策。

那麼，如果有一個「地位非尋常一般編輯可比」的大新聞業組合的首領相信按照這一類的辦法，便可以使德國政策趨向和平，並且漸趨於公開的途徑，他能不能用他的勢力來提倡那種政策呢？我們權且當作他是這麼辦吧。要使那種政策成功，便不可不要求英國人在他們那帝國統轄的領土以內放棄一點主權，這種要求一定是違反英國人對於國家權利和國家尊嚴那根深蒂固的觀念；那一定不免使多數人感覺不快和不安，全部的主張一定是很容易被人誤傳的。我們這驕傲的帝國觀念的人民的「直覺」和「自然的衝動」一定要一致起來反對這種主張。那些和這個不法的新聞紙主人在營業上

競爭的對手當然不會失去這個好機會。這些對手只要應付的本領充足，一定可以在那種合理的主張還沒有得到多大的響應之前，老早便激起了一種普遍的反感，因為他們可以訴之於一般人的衝動，偏見，和感情作用，比較那訴之於一般人的「再度思想」的，當然易於收效多了。並且這些競爭的對手還可以從那些被這種新政策所威脅的各方面得到絕大的援助和廣告的利益。假設十五年前北岩爵士採取了那種行徑，他也就不能成其為北岩爵士了。假使他的頭腦是能夠被那種政策所吸引的頭腦，那也就不會這樣非常的得人心了。假使他在波爾戰爭（一八九九年，英國與南非洲波爾人的戰爭）的前幾年初入新聞界的時候，不把靠近我們的天性的表面那些普通的衝動和感情作用充分發揮，却去從事於啟發那難於引起的理智作用，我想他一定不會有現在這麼大的勢力——那一定另外有那一位經營新聞業的人物走進了這片沒有人耕種的田地裏，那廣大的銷路和緊急的時候支配全國命運的威權想必也歸於他人之手了。

我們再拿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的選舉來說吧。當時英國——歐洲——遇着那歷史上

關係最大的國際協定問題要解決，西方社會就合力解決一種問題這一點而論，從來受時勢的要求須得決定的問題實在以這一次爲最大。如果要使這一次的協定不像從前那些國際「協定」那麼無用，不像那麼無聊，便非使一般人心中去掉從前那些協定裏面所充滿了的種種觀念不可。若是參加和平會議的時候，便先存着一種成見，認爲這種會議就是許多法官集會起來，對於某幾個有罪的國家分配相當的懲罰；認爲大戰的惟一原因便是這幾個罪犯國家之特別可恨；認爲他們的惡根性是不會改變的，無論歐洲換一種什麼新局面都不能改變他們這種惡根性——若是存着這種成見來參加和平會議，當然就使美國總統威爾遜所擬的那一類政策沒有實現的可能了。但是因爲有了這種拿一國當作一個罪人看的觀念作基礎，仇恨的心理是很易於激發的，於是便毫無限制的鼓吹起來，連美國方面也是如此。威爾遜自己似乎沒有看出他的政府所認可的所提倡的公開主義遭了這種抵制，便會去掉他實現他的政策所必須的力量——這種力量便是美國人平靜了下來的心里對於他的擁護。他的事業之所以太難成功，便是因爲美國人

的心理和他反對了。

政府對於某種某種的勢力還不明瞭牠們的性質，便放鬆牠們，或是助長牠們，結果每每自陷於爲難的境地，這種情形，可以拿去年關於賠償要求問題那幕活劇作個例子（註）。定出那些要求的政治家們都明知那些要求是完全謊謬絕倫的——也許覺得條約的全部都是如此。其所以要定出這些要求的條件來，爲的是「選舉的作用」。但是這些要求的條件定下了之後，徒然增加一般人反德奧心理的力量，那些政治家對於這種勢力是不能不服從的。所以他們簡直是自己餵養一隻怪物，與自己爲難，結果反而使自己的勢力越來越失去了。

（註）『巴黎方面的提案一定不是認真的主張，這正和原來的條約是一樣的。這不過是另來一套把戲，無論如何，玩把戲的人自己是不會再糊塗的。魯意·喬治說服了蒲列恩，使他相信了他的意見，認爲二加二不等於十二，而等於八，便覺得他使談判的前途有了進步，（也許是實在的）；蒲列恩又因爲他自己是長於口才的，便希望

能在法國議會裏極力發揮二加二等於八的議論，推翻潘格爾那二加二等於十二必更有利於法國的理論。（譯者按：這就是說他們都是錯誤的，不過是程度上的差別罷了。）像這樣的把戲，我不知道歷史上是否曾經有過。我想最好的解釋便是斷定這是我們所謂宣傳作用的過分發展的結果吧。這怪物已經脫離了當初造出牠來的人，不再受他們的管束了，於是產生了這種古怪的局面，世界上的幾位最有勢力的最聰明的政治家處在這種局面之下，也爲那無可逃避的勢力所迫，只得一天又一天的開會來討論各種程度不同的不可能的事情……現在這兩位首相在巴黎拿那些可笑的條款討論個不休，還有羅其爾在中間忙着斡旋，（其實他們都明知那些條款是無意識的）——這種把戲，凡是明白牠是怎麼一會事的人看了，一定覺得是一種怪象吧。」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滿起斯特公論報所載梅拿得·肯氏君論文。）

若是有時候北岩爵士或是別人似乎暫時持着一種與當時一般人的呼聲相反的政策——譬如每日郵報爲了一味強硬的攻擊紀青納爵士便在證券交易所被焚的那一次——

那不過是因爲北岩爵士對於大家的需要知道得比一般人更清楚罷了。他知道他們希望勝利的心已經是十分的浮近表面上來了，十分的確定和澎湃了，所以他縱或在這方面有所鼓吹，他們也不會容受了。他那些對手不採他這種途徑，足見他們在愛國精神和對於民衆心理的真正了解這兩方面而論，都是不如他的，（因爲他們也是「不顧一切」的贊助戰爭的）。

譬如以砲彈缺乏那個問題而論，那些次一等的「愛國之士」對於北岩爵士所下的攻擊便是很不得力的，他所領導的其他運動大半都是這種情形。他的社會的和政治的理想總是當時一般人所公認的普遍理想，這就是他的成功的主要原因。一直到歐戰的時候，北岩爵士的報紙始終沒有什麼一定的政見，大體說起來也許是英國最公平的報紙。即令有人反對牠的主張，只要用簽名的文章投到牠那裏去，牠都可以發表，那種容納公意的程度，凡是極力譏評牠的那些報紙都是辦不到的。至於歐戰期內，北岩的報紙選擇關於日常事實的新聞材料，也是替本國鼓吹，給敵國說壞話，也是拿「人屍工



廠」這一類的傳說來保持國人的仇恨和忿怒的心理，使本國有作戰的氣勢，也是極力的使那些足以減低這種氣勢的意見和那些不賣氣力來助長這種氣勢的人們失去信用——

這些事北岩爵士都有充分自辯的理由，因為政府已經有這種榜樣，一般人所公認的愛國精神的標準也是如此的。總之，這種『還沒有成器的報紙』的根本問題並不在乎辦報的人運用那興波作浪的伎倆，而在乎有那些社會的心理的和工業的狀況作背景。譬如以英國而論，即令沒有巴東賴或北岩爵士，也還是會有別的人物以個人的勢力支配當時的全國合力行動，不過要在剛纔所說的限制範圍以內罷了。這並不是說這等人便沒有勢力。他們的勢力有時候對於或和或戰這類問題還是舉足輕重的。若是逢着兩種政策的本能作用的立腳點差不多適得平衡的時候，處着北岩爵士那種地位的人的勢力當然是可以決定誰勝誰負的。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令是一點小小的勢力也是舉足輕重的。屢應該使我們不能放心的正是個人勢力之限制的性質問題。這類的限制便是以表現一種『心理的格列商法則』，（譯者按：格列商 Gresham 是一個大經濟學家，

他發明了一條法則，便是「劣貨幣驅逐良貨幣」，此處是借用，下文說得很明白，（前面所舉的事情便是一個例子；這正和商業裏面劣貨幣多了的時候必將良貨幣驅去是一樣的關係，逢着不同的主張彼此競爭的時候，現代的報紙只須迎合那些初步的觀念和衝動，只須迎合直覺和固定了的偏見，便可以激起大家來響應，比較訴之理性作用的再度思想，容易見效多了。無論那種報紙，只要是迎合衝動的心理，一定能在那些訴之理性的報紙得到人家的贊成之前，老早就得到大家的附和。

新聞紙利用羣衆心理，有時候也爲那種心理的情形所限制，這也是實在的。譬如魯意、喬治和北岩爵士兩人相爭，便表現了幾種很奇怪的事情，都足以證明新聞紙勢力之有限。歐戰期內一般人都表現一種特別的心理狀態，最易爲人家的暗示所動；那種輕信的心理真使人聯想到中世紀的那些滿腦子都是妖怪的狂態。一個人只要有一個德國名字，人家加他的罪便無論如何駭人聽聞，無論如何荒唐，大家也是要見信的。有一個暫時頗受人推崇的議員宣稱德國皇帝有一本神書，裏面有四萬個專好淫亂的英

國重要人物的名字，他因為知道他們的行爲，便拿來作要挾的條件，強迫他們替他作奸細，大家聽了這種話，居然也認真的相信了。報紙上也非常鄭重其事的談到這件事情。在這種感情作用和不穩定的衝動狀態之下，那些受一般人歡迎的報紙只要捏造一點荒唐的事情，或是重述人家一句什麼話，便可以將大臣驅逐去職，（譬如哈爾丹爵士之被逐去職，便是因為報紙上重述了『德國，我的精神上的家鄉啊』這句話）。民衆的心理是這種情形的時候，要靠理智來應付那興波作浪的報紙的暗示作用，那是沒有效力的。但是關於這些事情，也還是作得次數太多了便減少效力，心理學上有一條法則，說是一種刺激品對於一種器官所生的效力隨着重試的次數漸漸減少，利用羣衆心理也是一樣。歐戰終結的時候，一般人對於鼓勵的言論都因為聽得太多，覺得厭了；大家都要爽一爽心，所以對於政治問題也就不很重視了。那時候魯意·喬治便明白北岩爵士的報紙對於他已經失去了大部分的指制力。他簡直就對北岩爵士說，要他進地獄去。

（註一）他說了這種侮辱的話，居然無事。天還是沒有倒下來，喬治先生依然作他的

首相。北岩爵士纔知道——也許本已明白了——社會上一般人那種感情衝動作用都已疲乏了，他對於這位首相再下什麼攻擊，大家也是不會睬的。再逢着總選舉這一類的事情也許又把那絕大的勢力放在新聞紙手裏。但是當這個反動的時期，政治問題已經落後，喬治有了下議院受他的指揮，便可以和北岩爵士這般人作對手了。因為他們一時是沒有力量制服他的（註二）。

（註一）這話是魯意·喬治在下議院的得意演說裏面說的。

（註二）有一件事情，北岩的報紙竟能違反普遍的民衆心理，（爲的完全是偶然的私人的原因，）這也是因爲一般人這種不關心政治的結果。我所指的便是他的報紙對於法國政策的贊助。關於這類事情，我們就一般而論，民衆的意見現在當然是反對法國政策的。但是每日郵報對於法國的贊助並不影響牠的銷路。不過一般人對於政治問題的熱狂經了一番消沈的時期之後，若是又學法國人的榜樣，將他們的侵略思想向法國方面發揮，那也就不能這樣安然無事。那時北岩的報紙也就要用報紙時

美國赫斯德報的報紙所施的手段了。赫斯德君本是反英反日都極激烈的，大戰前總會出一種德文報，但是他一見大眾的反德心理到了相當的程度，便因為要維持他的報紙的銷路，馬上就極力倡仇德的論調，比他的同業更加吹鼓得出力了。

但是這種感情作用消沉的時期不過是偶爾有之罷了。差不多每逢緊急的時候——那就是說，每當最嚴重的問題要取決的時候——報紙對於民衆心理的勢力便是以上略說的那種情形：比較要用腦經的和推理的意見一定是被那感情衝動作用的意見所排除的。近代的工業和經濟情形更促着報紙越來越趨向那種衝動作用的危險政策。我們必須明白近代的工業和經濟情形對於這一方面的關係究竟是怎樣，這是很重要的。

斯威夫德(Swift)當初著了幾本小冊子的論文，他所發表的意見是與大家共認的意見相反的，結果對於全國人的意見和政策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但是至多他也不過銷行了幾千份。其中有一册最重要的便是他自己出錢印的。以當時讀者之少，隨便找一個小資本的印刷商人便可以出得起印刷的資本，足夠傳佈全國所有的讀者。現在呢，若

是一種特別的主張和大家公認的意見相反，要想收到成效，單論宣傳的工具便不是普通一個私人的財力所能辦到。新聞紙是我們現在從事宣傳的惟一有效工具，但是這種事業是一種重要的工業的經營，很有經濟的投機性質，普通的資本家除非準知道能博一般人的歡迎，那是決不會幹的。無論那一種報紙，若是所鼓吹的是不受人歡迎的主張，而要和那些根基鞏固的敵手相對，牠在經濟方面無論如何是不能成功的。所以我們實在是處於一個齷齪的圈套裏面，非常的難於打破，這種情形，凡是對於英國這一類國家的報紙產生的真相不明瞭的人是見不到的。

這個圈套實際上便是那些不斷的印出來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見解，牠們所包含的都是那易於喚起的情感——不一定是含在最深的天性裏面，而是在那易於喚起的衝動作用之中。我所說的這種新聞界迎合社會心理的結果便造成一種民氣和道德的守舊精神，大家都回復那初民的簡單頭腦，比較後得的社會品性都漸漸的退化了。但是英國爲助長大戰起見，曾經朝着國家社會主義的方向突然發生變化，這種變化若在和平

時代恐怕費半世紀的宣傳之力也不能產生；後來因大戰的結果，我們又有共產主義出現；我們想到這兩點，剛纔那種話便似覺有點離奇了。但是這些政策的氣性和道德基礎並不是新的；牠們都是和人類的部落結合同樣的早。人類保持權力和壓迫他人的本能，個人之沒入人羣裏面，那種不容個人思想或理想發展的極度黨合精神，那種爲本羣對他羣獲得勝利的決心，都不僅是古代部落思想和封建思想以及現在的法國波蘭和其他各處所採的政策裏面有之，便是共產主義那比較複雜的原動力背後也是有的。現在歐洲大部分的政策常在極右和極左之間搖擺，這並不僅是一種政治上偶然的事。因爲這兩者的氣性本是相連的。

現在歐洲的狀況便可以表現應用部落思想於現代的世界所產生出來的結果。這是必須矯正的。但是各種從事矯正的嘗試總不免遇着那初民的部落本性或感情作用。從前一切思想的矯正都是少數人的成績，都是個人的心思，都是因爲有幾個持異說的，博學的，或是著小冊論文的人能够經長久的時間將他們的意見灌輸於別人心裏，把以

前的偏見打破。但是現在的新聞紙却因為處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特殊經濟情形和工業情形之下，便起一種心理的格列商法則，所以對於個人而持異說者在社會上所能生出來的影響是足以摧殘的。假使從前的封建制度，專制政治，以及君權和教權都有現在這種機械的新聞紙作牠們的工具，使那些大部分心力為事業所佔據的住得很稠密的人民受着這種思想的羈靡，我恐怕那些專靠支配人心而存在的古代王朝的魔力始終都可以維持下來了。（少數的治人階級並沒有靠勝人的實力將牠的意志強行於那大多數的被治者。）現代的新聞紙似乎是要使我們對於國家，對於愛國精神，個人權利，和國際義務的觀念，以及依那些觀念而成的一切制度，都沒有改良的希望。

我們現在可以得到這麼一個結論：社會上種種的情形即是使辦報這樁事情不能不起競爭的現象，辦報的人當然也就以鼓吹一般人所熟習的錯誤觀念為穩當，並且易於獲利，當然也就不會對一般人說他們所不願意聽的事實，因為一般人對於事實雖然必需知道，却因為牠是不會令人高興的，所以一定不表歡迎。大家為自己的利益着想所最



應該知道的事情正是他們不容報紙上印出來的那些事情。譬如我們在烏爾斯德（愛爾蘭地名）有一種大衆的意見，因其對於天主教徒有一種不平允的見解，所以對於社會的平安是含有危險性和破壞性的，這時候最有利於大衆的事實便是足以使一個新教徒對天主教徒不爲過甚的那些事實。但是假設在新教徒盛行的烏爾斯德果真有那麼一種報紙，偏重於這一類的事實，和那說天主教徒如何如何可恨的報紙競爭起來，一定是非失敗不可的。又如歐戰期內和戰後的時期以內，歐洲的統一和恢復原狀以及歐戰後的復興事業都須要一種擺脫戰時的偏見的公意纔行。現在我們且拿休戰以來法國的氣性對於歐洲政治所生的影響來想一想吧。我們試就最低的限度說，法國如果有應付失當的危險，那種危險大致也不會由於對付德國人過於柔和而起。如果法國犯增加歐洲復興事業之困難的危險呢，那些困難多半是由於過度的反德心理而來。就事實而論也是如此的。但是法國報紙對於法國人的心理上必需盡的義務正是必不能盡的，因爲無論那種法國報紙，若是持這種論調，結果必使牠的營業一敗塗地。法國人最需要知道最要

提醒的事實正是法國的報紙爲顧全牠們的利益着想所不能說的事實。法國已經是當着紀大的全國危殆，但是最有利於法國報紙的事情却正是從事於增加這種國家的危險。我們要舉這類的例子是舉之不盡的。

譬如和平會議的時候，世人本是應該知道真相的。各國政府也須要使大家明瞭事實，以便牠們所認爲有施行的必要而表面上却不能使人認爲適當的政策，不致被大眾反對。但是一般人却不願意有人告訴他們，他們是不想知道事實的。譬如當時有那些形容德國人殘暴的新聞，那些事情雖然也許都『發生』過，但是就報上所選擇的新聞而論，却還是不及事實的一半。若要得到全部的事實——若要造成巴黎方面實見真正和平所必要的心理狀態——便非將別種的事實同時用同等的注重拿來說一說不可，譬如敵人的人道行爲，甚至協約國方面所作的殘暴之事，都要說一說纔行；並且還要提醒我們，如果美國人並不爲了每星期焚斃黑奴的行爲『被排出文明之外』，如果英國人並不爲了在愛爾蘭的強奪行爲和在印度的壓迫行爲『被排出文明之外』，那麼，德國

人所作的事也並不比這些行爲更殘暴，所以也是不能將他們排出的。

總之我們現在已經弄成了一種很不好的情形，即令是關於很細微的事情，如果有一般人的感情作用轉入了漩渦，便簡直不能說真話。哈得爾士頓君曾記載一件事情，足以作這種情形的代表，他對於那件事情是親眼看見過的。當比利時開一個國際會議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一個咖啡館裡發生了一件事情：一個德國新聞記者在那裏規規矩矩的作他自己的事情，忽然無端被一個喝醉了酒的比國軍官加以侮辱，他並沒有激怒的行爲，便被毆打了一頓。這件事情本來是沒有什麼政治的國際的或社會的重要的。這對於比利時當然也不算什麼恥辱。世界上無論那一個軍隊裏面都免不了這種的軍官，偶爾犯出這一類的錯處；那一位德國新聞記者之始終容忍與德國對於大戰的責任問題也是無論如何不相干的。所以這件事情或是說根本不值得記載，要記載便值得實實在在的記載出來。但是這件毫無關係的不值一笑的小事情却被那些報紙上記得非常詳細，並且盡是些捏造的話，都說那德國人肆口讒罵，唱着『大德意志歌』，搖着他

的國旗，而那位比國軍官呢，他們却說他是好意去排解，救那德國人，不使他爲那激怒了的羣衆所毆打。哈得爾士頓君的文章裡面說，『這件事情是我親眼所見的，而且無論爲誰着想也似乎用不着加以絲毫的粉飾，我讀了這種顛倒是非的記載之後，我簡直就懷疑起來，不相信報紙上所說的任何事情是可靠的，』（註）你想想，既是這麼簡單這麼細微這麼不易弄錯的一件事情還不能記載得實實在在，那麼，逢着更複雜更繁難的事情，大家即令很細心的觀察，還不能防止記載的歧異；怎麼能信得過他們的語呢？那些報紙對於上面所說的這件事情當然是犯了作假見證的罪過，這種假見證若是一個普通在警察法庭作見證的人說的，人家便可以拿僞誓的罪控告他。有了這些說假話的報紙，大家便像煞有介事似的以爲真有什麼『國有婦人』和什麼『人屍工廠』那類事情。這種方法所產生出來的精神便使歐洲的和平無法實現了。

（註）大西洋月刊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份。

那種精神之增長是因爲受了那些無限量的日常的誑話的毒。有一位替倫敦一個最

大的早報服務的很著名的戰時通信員有一次偶爾提到下面這樣一次經驗，作者曾親耳聽見過：——一隊澳洲軍隊和德國人打了一陣劇烈的仗之後，捕獲了一架德國戰機。那德國戰機手還是活着的。那隊澳洲兵因為看見他那麼勇敢，便在他的制服上標上一個字條，上面說道：『不要拿去這個人的鐵十字勳章吧；他打仗打得很拚命的；』於是又設法將他放在一個適當的地方，使敵方收傷兵的能够找着。這件事情正足以表示我們自己的軍隊的豪爽，偶爾說一說敵人的勇敢，也不過是證明我們那種豪爽的精神，但是那家大報却還是認為過分了，那位通信員爲了報告這個消息，竟接到這麼一個警戒：『請你不要再寄這類的消息來，說我們那些親愛的德國人的事情吧；我們最歡迎的德國人惟有死了的德國人。』還有一件事情，也可以表明戰時普通人的態度與軍人之不同，足見其比軍人更不如。當時有一架徐伯林飛機被擊墜地，有些德國人便死在裡面，於是大家討論究竟這些德國人是否應該受一種宗教儀式的葬禮，這時候便有幾個飛行隊裏的隊官寫信給剛纔所說的那個報紙，對於一般人認爲死了的德國人不應該受相當的

葬禮這種見解。加以反對，並且說明我們這方面的人在相似的情形之下落到敵人手裡，曾經受了這樣的待遇。編輯先生却回答他們，說這幾位隊官的信不能發表，因為那是與這個報的宗旨相違反的。諸如此類的事情要舉幾十——要舉幾千，都可以舉得出來，這些事情都足以表示那些報紙所持的不近人情的見解對於一般人的心理所生的壞影響；戰時的心理本是很壞的，從和約上那些不幸的收場看來，更足以看出那種心理的不祥的表現，當時本有少數人持人道的觀念，足以矯正這種心理於萬一，不使其壞到極點，而那些報紙却不但不能鼓勵這種人道觀念，反而使牠消滅了。

不消說，辦報的主人翁是懂得他們自己的利益的。假使有一個報紙天天除了記載敵人的罪惡和我們自己的好行為之外，還要記載德國人所作的好事情和我們自己所作的壞事情，那是非因那些專以抹煞事實為事的報紙的競爭而破產不可的。（註）我們簡直可以說，要希望別的，真是希望人情所不能的事。

（註）約翰森曾經說過：「開戰的時候大家只要聽兩種事情——是自己的好處，一

是敵人的壞處。戰爭之後，街上滿處都是學會了搶掠的兵，屋裡到處都是學會了說謊話的騙子，這兩樁事，我真不知道究竟那一樣更加可怕。」

所以新聞界所幹的事情便是改變正確見解的成分的比例，使某一種成分成爲全部的主體；若在比較健全的狀態之下，本是可以有別種的成分和牠相對抗的。我們把事實替『我們這一邊』稍事舖張，給大家一種懷疑的餘地，那也許是不能免的，甚至是有益的也未可知。在最不開化的社會裡面，關於這點本沒有多麼大的危險。但是有幾種力量使得現代報紙那種趨勢非常的危險，這幾種力量便是我們現在所討論的。

最顯著的便是那非羣衆的心理對於羣衆所生的影響。在古代的社會裡，雅典還可以聽從牠的蘇格拉底，不過也是在牠受了他多少影響之後纔聽從他。雅典人曾經聽見過他的言論——許多的人都聽過他親口所講的話。他與安尼達多少總算是立於平等的地位：一般人比較有頭腦的都聽他們的辯論，並且還轉述於別人。現在呢，羅素和巴東却不像他們那樣的立於平等地位了。戰時巴東的話每星期都有千百萬人聽——

在文字方面，他的報紙銷行幾百萬份，此外還有他在普通集會和議會裏的演說。他便是那些支配全國，造成國民性，決定國家政策的大勢力之一。至於羅素呢，全英國若干百萬的人根本都沒有聽見他的聲音。他們所聽見關於他的話，只是說他是一個『害羣之馬的和平主義者』，（巴東賴先生一定要這麼說）說他被送入獄，受那管束奸細和敵人行動的治安法令的制裁，都是很應當的。

現在我們且認定英國根本上並不全是巴東賴，餘外也還在英國的本性裡面隱藏着一個潛在的羅素，一個狄更生，一個哈布森，實在的愛真理，極欲看見英國不僅是那麼『橫蠻』的，也要是公平大度的。我們再認定這兩種成分都是一個腦經健全的人所必需的，這一種成分矯正那一種。那麼，在這種工業化的競爭的新聞事業的環境之下，第一方面有了巴東賴先生作主腦，第二方面那裡還有和他較短長的餘地呢？我們拿事實來看吧。現在新聞業的情形簡直是使巴東賴他們造成國民性的機會一天一天的多，使羅素和狄更生他們的機會一天一天的少啊。



現在所研究的這些勢力不僅是與機械般的支配思想有關係。這些勢力還要將全國的氣性都改變了。這般操縱的人不斷的激動大家的感情作用和羣衆心理，因此也不得不尋出一些合人脾味的話，極力和對手方的新聞紙相競爭，使自己的影響更廣更成功，一般人的心理因此也就趨於狂暴，不受大衆歡迎的意見便沒有充分發表的機會，因為這種種的結果，社會上那種重視反對的意見的能力便消滅了，而我們要惹啓發大家對於各種社會問題的思想，却非靠相反的意見不可。歐戰起初的三年之中，使政府發生變動的那些手段只好說是道德的私刑。一九一四年指摘愛爾蘭或格雷爵士的人被逐出政府以外，還有可說；那知道兩年以後，擁護他們的人也是這樣的被逐呢。一月裏的愛國者六月裏便成了「親德派」了。恰恰相反的意見鼓吹起來是同樣激烈的，健忘的民衆只爲衝動所驅使，不假思索，便聽從這種暗示，反正是隨聲附和一陣了事。從前的社會環境可以養成英國人對於政治方面的公平態度，不盲從大衆的狂呼，始終持堅他個人的意見，對於反對方面的論調也能容受，這時却完全不是這樣的情形了。現在似

乎是人人都對於這種『罵人的報紙』恐怖起來了。

在現在這時候的英國，留心觀察的人便發覺這種特別的景況：差不多無論在那一方面，各種的意見都是私地的發表，簡直不能得到向大眾發表的機會。於是所謂『輿論』簡直就不能代表真正的意見。但是大家假使都把他們個人心裏的話說出來，他們所抱怨的這種輿論想必也就不同得多了。大家既不能對於社會心理盡這一份必需的道德上的力量，社會一般的心理當然也就因此爲那最壞的成分所支配了。所以凡迴避這種公民責任的人，對於這種盲目的心理既沒有盡力制止，那麼他們若是終於因此吃了苦，也就不能抱怨了。

因爲有了剛纔所說的這種問題，所以發表一時不受大眾歡迎的意見一定有大不利的結果，這點誠然不錯；但是大家若是對於這一方面都肯盡他們的公民責任，一般人的頭腦必漸趨於清醒，情形也就不同了。錫來氏說得好，『無論那個國家最要緊的基礎便是思想的習慣。』現在雖然馬上就要提出幾種主張，作爲解決這個問題的工具方面的辦

法，但是無論如何解決，都非人人有這種道德上的貢獻，發表他的「不受歡迎」的意見不可，這是當然的。假使大家迴避這種責任，那麼，我們最後終究不能不依靠的「思想的習慣」也就要成爲一種糟糕的習慣了。

### 第三章 新聞事業與舊社會制度

實行平民政治的成功條件便是人民決定什麼事情的時候，必須事先對於他們所要決定的問題，完全明瞭其中的真象，然後決定。否則平民政治雖說是拯救平民的，結果反而成了人民的陷阱。譬如那種糊塗的選舉吧，最明顯的事實都因感情作用的蒙蔽而不明了，最簡單的真理都爲大家在紛擾之中的喧聲所壓倒了，而有些人却揚揚得意的指着這種選舉的結果，說是民意的表現，也就是上帝的意旨的表現，我說這種人真是還不曾學過平民政治的 A · B · C 。

我在前面已經引過錫來的話，「無論那個國家的基礎便是思想的習慣。」普魯士極力的勸服了幾百萬青年人，使他們認為有替國家犧牲的義務，應該為普魯士主義——為「祖國」——犧牲性命。（你若想買動一個人捐棄他的性命，那是不很容易辦到的，除非你也像有些人那麼說法，使他非常相信天堂裏有他的大廈；所以我只好拿義務這類話來說服他。）這種希奇的事情之所以能辦到，便是全仗支配全國人心，操縱國人所能得到的知識，青年時代以教育為工具，後來便靠新聞紙的宣傳。要知道普魯士執政階級的幾百個年長的人之所以能施行那種政策，使常人作那樣的大犧牲，並不是仗着武力。很少數的一派人要藉武力強迫千百萬人順從，當然是不行的。極少數的人藉着操縱羣衆心理，藉着主持暗示羣衆心理的工具，使得制服大多數的人，這種手段是歷史上常見的事：那般被奴使的民衆一次又一次的被指使着拼命和人家戰爭，徒然使他們在物質方面，軍事方面，經濟方面，宗教方面或社會方面所處的奴隸地位繼續延長，而對於有意解放他們的人反加以仇視，其所以如此，便是因為受了這種魔力的誘

絆。

我們現在的工業專制階級用這種操縱人心的手段作達到經濟的和社會的制服羣衆的方法，其中最有力的工具便是現代這工業化的新聞業。我們這經濟的普魯士主義藉着這種方法便可以支配全國的人心，造成全國的民意，指揮全國的情緒，決定全國的判斷，無所不能了。

但是資本主義的新聞業在經濟方面或軍事方面爲什麼定要學普魯士主義呢？泰晤士報，每日郵報，紀事報，和晨報的主人爲什麼不作可敬的民意和政策的匡正者呢？歐戰的時候有什麼抹煞事實顛倒是非的情形，那豈不是由於他們這些人也像我們其餘的大多數人一樣，爲感情作用所驅使嗎？他們爲什麼要阻撓社會進步呢？我們現在這些聰明的雇主難道還不知道工人的幸福便是生產能率和生利的一部分嗎？根本說起來，勞資兩者的利益豈不是互相依靠的嗎？資本主義的社會，連牠的新聞業也算在內，豈不是準備着以公平待工人嗎？每日郵報不是已經給勞工界公開了嗎？爲什麼勞

工又非要有一個自己的報紙不可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須看英國的工人前途的使命是怎樣的。如果只求改良物質上的情形，增加工人作資本家生產的工具之效率，那麼，舊有的報紙還是可以滿足他們的要求。既是普魯士的政治專制階級還有那麼眼光敏銳，知道很費苦心的由國家定出辦法，改良工人的物質情形，英國的工業專制階級當然也就沒有不肯這麼辦的道理了。

但是英國工人如果打算打倒所有的專制階級，爭英國人民對於他們的日常生活的自決和自治，以及關於最關重要的事情之自主權——這些事情，只要是人力所能做到的——那麼，他們必不可少的成功條件便是要自己有一個日報。

我們且先看這種自治所包含的意義是怎樣的，然後再看舊有的報紙爲什麼非反對這種自治不可。勞工自治的要求便包含着一種根本的道德問題，差不多完全超出物質條件的問題之上，關於這點，大多數的資本家和少數的工人始終不曾顧及。這可以拿一個戰爭的譬喻說明一下。西方的民治國家爲的要使比利時捷克斯拉伐克巨戈斯拉維

亞脫離普魯士的宰制，剛剛犧牲了幾百萬青年的生命。設使當日要將比利時吞併的德國人表示他們的理由道——事實上他們也曾這麼說過——「比利時一旦歸德國統治之後，德國人對待他們一定不亞於比王愛爾伯；比國工人的工價一定像德國一樣的高，他們一定能得到一切德國勞工法的好處，布魯悉（比京）也一定能像慕尼黑（德國巴瓦拉邦之首都）一樣的潔淨，一樣的管理得法。」德國人是那麼辯的時候，我們便說他們還沒有明白歐戰所爲何事；我們說比利時人和塞爾維亞人所爭的並不是高價的工資或保險條例，而是自由；我們說「好」政治決不能代替自治。現在一般討論社會衝突問題的人大多數也是不明白其中的根本問題，猶之當初那些主張吞併比利時等地的德國人之不明白他們的敵人的動機一般。

實際上的情形怎麼樣呢：在現在這種社會制度之下，少數的經濟專制階級對於全國其他的人，對於千百萬人的日常生活所具的勢力實在是大到了極點，比較德皇或他的政府對於波蘭人和亞爾薩希亞人或是奧國對於塞爾維亞人所具的勢力，實在還不知

道要大多少。今日的英國工人處在一個特殊階級的掌握之中，這個特殊階級的勢力和從前普魯士那個軍事的特殊階級的勢力是同樣的堅固，不過他們運用的方法不同罷了。僅有爲一個政黨投票以與另一政黨對抗的選舉權，實在是一件很可憐的事情，因爲兩黨縱或誠心的希望實行羣衆的意志，無奈社會的和經濟的制度事實上爲一種政治範圍以外的勢力所支配，兩黨同受這種制度的抵制，無可如何，所以僅有那種選舉權是無用的。

千百萬的工人對於選舉視爲最不關緊要的事情，他們天天都惟恐這些特殊階級的人決定什麼辦法，將他們置於失業無依的境地；惟恐他們決定把某種工業從甲地移至乙地，或使之變爲一個托辣斯，或因裝置某種新發明或採用某種新原料而起變化——這些事對於工人們的生活都有關係，但是他們却絲毫沒有支配的力量。這還是把那些工業上的專制魔王的個人任性行爲和自大的習氣丟開不提，大抵這些人有了勢力便多如此，無數的人都因此吃苦，簡直就像買賣的奴隸一般，沒有辦法，日子久了也就漸



漸的有幾分奴隸性了。

但是這還是這種特殊階級的勢力最小的一部分。這種特殊階級的影響和牠的階級觀念便支配着法律和司法，支配着教育和許多種的藝術，以及有組織的宗教和許多的社交，就連我們的遊戲和消遣也是要受其支配的。這種階級的地位真是重要極了，牠差不多是機械般的能夠決定我們所處的社會的形式和性質；能夠使牠自己的地位永爲治人階級，使那包括全國大多數人的固定的奴隸階級永久存在。這種階級在這種將勢力，威權，安逸，文化，自治和社會上的敬仰給予那幸運階級的社會組織之中，向來是能夠爲人所默認的，而大多數的民衆却自以爲當然似的，甘受一種性質迥乎不同的生活，甘受不同的教化，因此在社會上也就一定不疑的佔着一種次一等的地位，永遠帶着那奴隸階級的特別標記，他們不但自己甘爲婢僕，還情願訓練他們的兒女，也爲婢僕。這個奴隸階級之中雖然也有極少數的人儘可以運用分外的鑽營本領和毫無心肝的把弱者推在一邊的手段，跳出他們的奴隸圈套，奪到一個別的地位，藉社會的不平

以圖自利，但是上面所說的那種普通的情形實在是絲毫也不因此有所改善的。

若要把這種局面打破，若要取消這種經濟的特殊階級，想靠這個舊階級自動的實行，大致是沒有希望。勢力和威權，以及支配別人的地位都是人們所最喜歡的，人們爲這幾件事是不惜抹煞良心的。在我們當前這個改造的時代裏，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那些足以促着改造事業順着工業的平民精神的途徑實現的事實，我們如果希望那般工業特殊階級的走狗很公平的給我們報告出來，那真是作夢。

並且即令如我們的夢想，那些主辦新聞事業的大首領忽發宏願，要把那給他們錢財和地位，給他們許多頭銜和支配政府與民衆的勢力的社會制度推翻，恐怕那種制度自身也還是要藉着牠的組織阻碍他們那種改革的志願。因爲他們自己便是受牠的制制的。

那種制制的作用，前一章裏已經討論過一部分。但是此外還有幾種事實也是應該說一說的。

屬於雇用僕役的階級或是與那階級相近的那三分之一的人所供給的新聞讀者，較之其餘那三分之二的人所供給的還是多得多。在現在這種狀況之下，真正銷行得廣的報紙多半還是要到他們所辦的報當中纔找得出來。勞工政治運動當然是要分去他們的勢力的，但是現在勞工的報紙多少不免受『罷登廣告』的抵制，假使一味鼓吹提高工價和改良勞工待遇的報紙不一定要受這一類的抵制，那就不但可以分去相當比例的一部分廣告，並且還可以使他們所損失的的廣告超過銷數上的損失。

辦報是一種很大的工業的經營，所需要的資本約在十萬至一百萬磅的現金，若是逢着迎合羣衆心理更快更有成效的對手出來競爭，還很容易虧本。像這樣多的資本通常都是用招股的方法從大家身上募集而來的，而這些入股的人對於他們的投資便視爲一種純粹爲得利息的勾當。在這種情形之下，假使有一個通常的資本主義報紙的主辦人對於勞工階級取同情的態度，和他競爭的對手方便可以利用那一時的羣衆偏見，大呼『赤化』以罵之，這時候這個主辦人的地位便將怎樣呢？假設他是誠意的吧，他那些

股東一定會馬上表示意見，說他不應傷害他們的財產來鼓吹他的主張，這時候他一面要顧到他的主張，一面又不能不替他的股東賺利錢，這兩種觀念便不免互相衝突了。並且他即令不管這一點，也還是有問題的，因為他雖則爲了那種主張犧牲銷路，但是銷路既經減少，他的報就連對於他那種主張都沒有什麼好處了。

有人常說，現在的報紙之所以始終擁護現在這種社會制度，是爲了別的原因——持這說的人認爲『圖利方面』和『大營業』以東家的勢力支配報紙；認爲他們藉着這種利害關係，便聯合起來直接支配新開業。這就把新聞事業弄成了各種資本家利益的工具，而不是各種資本主義利益之一的工具了。

登廣告者合而爲一，對於報紙所具的勢力是絕大的，這一點在下章裏說得很明白。但是連那種勢力也還是可以鋪張的。真正銷路廣的報還是勉強可以比較的不依賴登廣告的人，那就是說，他們可以不必爲招徠廣告起見，改變他們的主張。並且無論如何，除登廣告者而外，『大營業』對於新聞業的關係並不是主僕的關係。將新聞業視

爲別的圖利方面的工具的見解是一種普通的見解，但是以事實的全體而論，（至少在英國方面，）却並不足以證明這種見解之正確。總而言之，英國的「大」新聞業的真正主人總算是很明顯了。新聞業本身便是一種資本主義的大經營，很少單只用爲附屬於別的圖利事業的工具。新聞業也許不知不覺的以平等的資格和別的資本主義事業相「勾結」，但是因爲牠本身是一種資本主義的經營，其規模之大又不亞於鋼鐵和造船等業，所以通常的主僕關係絕不是別的資本主義事業對於新聞業的關係。

實在說起來，新聞業與資本主義的真正關係，比這種關係還要重大。有時候有些圖利方面爲促長他們的利益起見，便取得支配新聞紙的勢力，這種事情是間或有的，最近有一件關於煤礦主人的事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這種方法在德國和法國甚至是很普通的。若在英國却不普通，我們如果認爲這就是攻擊資本主義新聞業的最大罪狀，那就未免錯認了這個重大的問題，也未免錯認了現代新聞業之所以成爲一種社會的危險了。

阿甫頓·信格萊君似乎是認爲新聞業不過是其他事業的工具，但是他所說的話也還是有許多足以證明新聞業是一種獨立的資本主義的事業。他說，「新聞事業便是工業的特殊階級所恃以保持牠支配平民政治的勢力的手段之一；除了選舉運動的宣傳之外，日常的新聞也使得民衆的心理常在一種順服的狀態之下，所以每次選舉的時機一到，他們便跑到投票箱前，替他們的剝奪者兩個候選人之一投票。我們說美國的新聞業是一種專爲經濟的特權謀利益的事業，牠天天將新聞報告出來，無非是爲這種作用……」

「實業的帝國」用來保持牠支配新聞業的勢力所採的方法有四種：一，自辦報館；二，收買報館主人；三，廣告的津貼；四，直接的賄賂。他們用了這幾種方法，便將美國的新聞和時事評論完全操縱，這種絕對的勢力較之其他工業上的壟斷更厲害了。」

但是他又繼續說道：

「現代的新聞紙是一種需要絕大資本的事業。從前一個鄉下的印刷工人便可以用的手印機印出那關於村上某鐵匠的女兒的婚禮和基督教促進會的聚歡會這一類的

消息，這樣便可以成一個新聞家：現在這種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的人都知道要看戰場上或是議事廳裏前一小時的消息。他們即令不能從本地的報紙上得到這類的消息，也可以從那快車上拋出來的大城市發的「號外」上得到。辦報的人要從全世界得來這些消息，所費的代價是很大的；在多數的城市裏這種散佈消息的事業便是一種絕對的專利事業。你如果沒有很大的銷路，便出不起錢收買這類新聞稿，也就不能印出這類消息來；而要求銷路之廣，你便非有複雜的重價的印刷機和高大的建築以及經驗很足的記者不可。有時候你還要附設一個廣告公司和一個介紹職業的機關；有時候你還要拿錢給送報的人，請他探聽教區的醫院裏的情形，或是募集捐款替我們在法國的陣亡戰士立紀念碑。換句話說，你必須辦一個規模很大的組織完備的機關纔行，必須日日夜夜的極力引起大家對於你注意，費盡你的腦力和別人的腦力競爭，吸入大家的錢來。

不消說，有時候你所作的便是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的一種事業。你雇用着幾百或至

幾千的男女老幼的人。你也依照那天經地義的工資定則給他們工資，驅使着他們拼命的工作。這些人裏面也有工頭，經理，和董事，簡直好像你是開一個鋼鐵廠或是開一個煤礦一般；並且你也有警察和偵探，法官法庭和監獄，以及用機關鎗的軍隊和有戰艦的軍隊保護你和你的利益——儼然和這種剝奪的制度之下的其他事業一樣，因為你也是這種制度的一部分。你當然也有那資本家的心理；你完全的恰恰的有這種心理，因為你便是這種制度的最活動的一部分。〔註〕

(註)見The Brass Check 第111111頁。

某幾種圖利事業直接利用或支配新聞紙這種事實在美國比在英國普通，這也許是實在的。其中的原因大半是由於地理關係。美國地方很大，不像在英國似的有一兩處新聞事業的中心地點。在英國呢，譬如滿傑斯特和伯敏漢這種城市便受倫敦新聞業最厲害的競爭。在美國却不然，芝加哥和舊金山事實上簡直就不受紐約新聞業的影響。美國每一城市，凡是比較大一點的，都有牠本城的報，當然比較大都會的報是要小一



點。美國的日報沒有那一家比得上倫敦每日郵報的銷路。所以英國的新聞事業，因為大家都認為簡直是工業的經營，便與國內其他大工業在經濟方面比較的立於平等地位。實在說起來，新聞事業真要算是最大的工業之一。他們的利益並不常與其他事業的利益一致。（最近還因為製造新聞紙印刷用具的實業家主張行保護政策和用這種用具的各報不主張行保護政策，彼此發生爭執。關於這種爭執，究竟那一方面能得勝利，那是沒有多大疑問的。）

阿甫頓·信克來君會細心的說明，連美國也沒有「一個完全有組織完全有自覺的資本事業統治機關。」我們現在的情形是許多種的結合分立着互爭勢力；有時候這些結合便彼此翻臉，互相衝突，於是我們便看見「作賊的弄翻了臉，君子人就明白了」這句古諺在現在實現了。

「譬如當初紐約報揭破人壽保險的黑幕的時候，你若看見了，一定要推想這種報紙是顧全公眾的利益的。關於這件事情；在美國方面要算已故的法官傑姆新·狄爾最

有密切的關係，我因為和他熟識，便得到了其中的真相。狄爾在紐約辦了一個公佈消息的機關，辦了幾個月的工夫，將這件事大部分的黑幕交給那些報館的訪員。他曾經把一切進行的情形老老實實的告訴我，我便知道這件震動全國的事情根本上不過是摩根和黎安他們將那人壽保險的錢的支配權由金美·海德他們這般不負責任的人手裏奪過來，交給負責的人管理罷了——所謂負責者，即是對摩根和黎安負責。這件揭破黑幕的事情完全是爲的這種目的而作，所以這種目的達到了之後，什麼立法調查和新聞紙上的呼聲都馬上就停止了。」

我們在英國方面當然也可以指出幾種與此相似的事情來，但是一定不及這種程度。我們的最大危機還不在乎這一類的把戲。這類事情的關係根本上也許是同等的重大，甚至更重大，但是我們的危險並不以此爲主要部分。

信克來氏還說及他自己的一種親身的經驗，那是與我們的根本問題比較相近的：「那是一八九七年或是一八九八年的事情。當時我是一個中學畢業的學生，不幸

上了這種「造成騷亂」的新方法的當。我有一天在街上走着，聽見賣報的人大呼「鑿外」，我一看是紐約晚報，前一版上大大的印着這麼幾個字：——

## 實行宣戰！

於是我便把我那辛苦賺來的錢花費了一個辨士，買了一份，待我一看，却是：

不久即將

## 實行宣戰！

但是我受了這一次小騙，是不是從此便再不買赫斯德報紙呢？不。我是個美國人，報紙上印的這一類動人聽聞的大標題，我決不能不看，這正猶之一個驢子見了一片長得很肥的金花菜不能不吃一樣。於是我還是看一種赫斯德的報——探察報——眼看着赫斯德先生說動我的心，使我相信那香併數百萬畝的赫斯德地產歸於美國的流血慘劇將要實現了。赫斯德的報和阿第士的報都發表了很詳細的記載，述說政府

如何預備進攻墨西哥。關於外交上的談判和軍事上的準備，都有詳細的敘述，那些話都是說得又仔細，又周到，並且是顯得完全可靠的。後來忽然一下子國務院裏發表一道正式的聲明，否認有這種打算，或有這類的準備；泰晤士報和探察報都發表了這種否認爲聲明——但是仍舊繼續着造他們那些謠言！我簡直就摸不清楚是誰在撒謊，不知道說假話的究竟是美國政府還是美國報紙。」

既是赫斯德鼓吹對墨西哥宣戰，爲的是他管有墨西哥的土地，那麼，當初歐洲報紙鼓吹對南非戰爭，我們是否認爲他們是因爲管有南非的礦產呢，他們鼓吹對德宣戰，是否因爲他們管有阿爾塞希亞方面的產業嗎？我們可以有一種更簡明得多的說明。北岩爵士的金礦便是更顯然的例子。波爾戰爭的熱狂之增長便是靠着每日郵報和晚報的銷數之增加。有些辦報的人藉着一時民衆的氣性，極力的利用牠，因此得到很多的錢財和很大的勢力，這種利益較之他們從事操縱證券交易所或是擁護別種事業的利潤爲第一種利益所達到飽和益大得多了。凡是一種大規模的經營是能夠的。

這種不能不承認：他每日所幹的事只在一點——那就是適合他的讀者的心。其餘無非是附屬於推廣銷路問題的事。實在說起來，那便是當編輯的人真正的業務，至於他們的報所持的宗旨是否使這一圖利方面或那一方面高興，那是他們不常顧及的。

如果關於這點始終還是有人堅持別種的道理，那實在是因為我們若不仔細打算，便不免忽略我們所要應付的關係最大的勢力。新聞業本身便是一種很大的資本事業，不單是其他事業的工具，並且爲了要達圖利的目的，便不得不設法利用人類的弱點，這件事情不僅本身是一種社會的重大問題，而且也是我們以後應付這種問題的計畫之中所不能不詳加考慮的。

這都是關於這個問題比較的應該加以周密考慮的。

## 第四章 資本主義，民主主義與新聞事業

由上面所說的看起來，大體可以得一個結論：對於新聞業最關重要的資本利益即是新聞業的本身。

如果我們要對於新聞業的真正地位得一個真確的觀念，我們便應該明白牠本身是一種絕大的資本主義圖利事業，其圖利的方法便是相機而行的利用羣衆心理；我們還應該明白這種「營業」不僅使少數人得到很多的錢財，而且還使他們得到比政府的勢力還大的勢力，這些個人的行爲也就大可由這種「營業」看出其動機了。

新聞業競爭的情形使得一般的報紙不得不極力助長羣衆的某種氣性；大家都只愛聽謊話，所以愈說謊話便愈能賺錢，而於他們最有利的真話他們反而不高興聽，所以說真話便莫想賺錢；這些道理我們也都明白了。新聞事業爲圖利而起的競爭所產生的社會的和道德的結果便是這個問題之中最根本的問題。但是新聞業與資本主義還有幾種次要的關係，那也是很重要的，不可不加以考慮——我們要上平民主義或社會主義的途徑，尤其應該注意到這點。

新聞紙與登廣告者的關係便是這些次要問題之一。現代的報紙在經濟方面而論，簡直是登廣告者供給給大眾看的。讀者所出的一兩個辨士還不够出報的本錢——如編輯的薪俸，搜集材料的費用，以及電報，印刷和白報，尤其是白紙。讀者每天所出的報錢實在為數很少，不過在他的點心，烟捲，茶，酒，和藥錢之外加上一點罷了。這種費用在經濟方面而論，對於消費者並不全是無益的損失。譬如我們要買架打字機，若不是看見廣告，便要出二十鎊錢，現在有一種新式的打字機，只要十鎊錢便可以買一架，而功用却是相等，我們若知道這個消息，即令這種廉價的打字機另加了一點廣告費在裏面，我們也還是合算。（廉價的打字機之所以能廉價，當然是因為出品多，價值平均，而要辦到這步，又不能不將牠的特長廣為宣揚，所以我們可以說牠另加了一點廣告費。）這便是主張登廣告的理論，我們也應該知道經濟上有這麼一種道理。所以我們攻擊新聞紙像現在這樣登廣告，並不能將一切關於大家所切要的貨品所登的廣告都包括在內。

但是在經濟方面而論，實在是再沒有比現在事實上的情形更壞的了。據現在這種辦法，報紙上給各種貨品所登的廣告，其篇幅之大小並不依那些貨品對於大家的用處之輕重而定。譬如一種肥皂或威士忌酒，和別的許多肥皂或威士忌酒是一樣的，大家都登起廣告來，佔着大塊的篇幅，這種篇幅若拿來登真正重要的東西的廣告，一定是足以幫助着改變大家對於物質方面的心理。現在決定各種廣告所佔的篇幅之大小却只依一件事情——賺錢。而賺錢之多少又要看大家的輕信和忽略以及充量的催眠作用到什麼程度，因為廣告所能利用的便是這些弱點。這樣一來，不僅大家被騙了許多的錢，就是新聞業自身也因此弄得很糟，歸入圖利事業的範圍了。

現在我們再看登廣告者之支配新聞紙的政策和態度，究竟在那幾方面，究竟到什麼程度。

登廣告者必是圖利的人，他所關心的便是頭針香烟威士忌酒肥皂或丸藥如何銷售的問題。我們可以斷言他對於這些事情必是日夜的苦心籌劃，全副精神都用在上面。



他所受的訓練便是專門以從這些東西裏面取得最多的利益爲目的。至於政治和社會問題呢，他便以早晨茶餘的工夫隨便看過了事，或是在乘地道電車的時候看看題目。但是這並不是說他對於這類問題沒有堅強的意見，事實上絕不如此。我們對於各種的事情，理智上的了解愈淺便愈有強烈的感覺，譬如對於宗教的教義便是如此。那種人對於賣頭針這類問題多半能下內行的判斷，而關於政治和社會問題這一類次要的事情便是給他消遣的，他那外行的偏見常是要充分的表現出來，譬如他們對於對德宣戰這件事，便極想把德國人打個落花流水。

這種感情作用增長到相當程度的時候，他是很能犧牲一點工夫以求滿足這種感情作用的——有時候便要干涉他登廣告的那些報，說他們不盡力激動那種感情作用。所以登廣告者的商業利益即令沒有直接關係的時候，他的影響也還是足以使新聞業助長那盲目的本能作用的勢力，在本書第二章所說的勢力之外再加一層。(註)

(註)大資本之干涉報紙的行爲在美國比較在英國直接得多，明顯得多。經濟問題

對於美國人的公共事業顯得關係大多了，大多數的美國報紙便與那些經濟的結合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有時候便有些駭人聽聞的事件，表示經濟界對於新聞界的勢力之大。愛得華·羅斯君曾著了一本書，叫作情形漸變之美國，上面說到一家報館的職員，每人都有一張單子，上列十六家公司的名字。那家報館的主人是對於那十六家公司『有經濟關係』的，所以特地禁止攻擊牠們或報告任何不利於牠們的消息。羅斯君也提及了罷工的時候資本家的結合指揮着各報反對罷工工人所發生的影響。

談到『大營業』和政府兩方面對於新聞業的影響，通信社實在是比各報本身還重要得多。關於這點，前面已經隨便引過例證了。譬如吧，美國大約有九百家日報接受並發表合作通訊社的新聞稿件，差不多所有的有勢力和銷路廣的報都包括在內。所以凡遇一件重大事情，這一方面的消息便要印一千五百萬份，看的人大約就有三千萬之多。據正式表示，合作通信社是一種互相的營業，管有牠的即是用牠的稿件的各報。實際上却並不如此，支配的權力只操之於四十家報紙的主人或經理

人之手，自這個機關成立以來，他們便佔有特殊的地位。一九〇九年的時候，用牠的稿件的七百家報紙僅有七分之一以下的投票權。其餘的投票權是由那些賣與少數人的股份分享的。幾年以前威爾·歐文君在哈伯週刊發表的一篇文章裏，便曾說到那『守舊的，享有四十一個管理合作通信社的投票權的報紙。』這種組織的股票是每張二十五金元，該社組成後，各大主持的人便每人買了一千金元的股份，因此享有四十個投票權，另外加上一個，作為社員投票權。

各大通信社之間的國際聯合，前面已經提及過了。這些通訊機關為宣傳起見，很可以彼此合作，使牠們的消息具有很大的勢力。譬如最近英國方面各報與通訊社的合作，便被利用以達法國政治宣傳的目的。凡是重要的英國報紙都由法國的一個特派員供給新聞稿件，辯護法國的主張，這些稿件都是為了這種特別作用送到倫敦來的。但是在斯坎的納維亞却有點不同，各報對於很容易認出是法國宣傳品的電報都不肯發表。至於波蘭，法國對於『東方』通信社所取得的勢力是絕大的。此外在美

國方面，也派有特派代表團，使他們極力作新聞上的宣傳。關於南美洲也採用了類似的辦法。法國在墨西哥的新聞宣傳運動業已開始了。僅在一年之中，有一位法國宣傳員便爲這種運動用了六百萬佛郎之多，其規模之大；由此可見一斑了。

但是登廣告者的勢力根本上還是在於登廣告者與生利和私有資本的制度之間的經濟關係。現在要想對於社會主義加以一般的討論，那是出乎本書的範圍以外的。但是現今的社會制度之壞到了極點，大概是大家的共同觀念。無論如何，總非加以相當的改良不可。卽令我們不以社會主義爲歸結，我們爲應時代要求起見，也應力圖改革，而要使改革事業之實現，又非使民衆知道一切事情的真相不可。

在已往的一兩年中，有些事件是大家必須知道事實纔能決定方針的，但是新聞紙却不曾將事實告訴他們：現在我們拿這類事情之中特別顯著的幾件來研究研究吧。在改造的時期，關於礦產，鐵路，航船，以及其他公衆事業，至少要保有國家管有的權力，這是大戰期內業已知道必不可免的辦法：這個問題便是第一個例子。其次是我們

的教育制度必須改良和改組的問題，這件事情有兩種目的：一方面是要增加國人對於專門技能方面的能力，（要想以製造品和他種貢獻供給世界，便要靠這種能力之增加，所以拿牠的經濟關係而言，是必不可免的，）一方面是因爲選民之中剛加了若干百萬的婦女，毫無政治經驗，所以要使她們有清晰的頭腦，不致對於各種問題有錯誤的判斷。第三個例子便是西方各國對於蘇維埃政府在俄國的實驗的關係問題。這三個問題都是根本的社會問題；其中的兩個是牽及未來的社會組織之方式的全體問題的。如果我們要使公衆的意見——平民政治下的判斷——有點價值，如果人民要有自治的能力，那麼，關於這類問題的真確事實，他們便非有很易於得到了解的機會不可。

逢着這類根本問題發生的時候，種種事實每次都被各報故意的瞞住，其所以如此，一部分（決不是完全的）是由於那些圖利事業方面都是主要的登廣告者，他們所造成的一種制度，便產生這種結果。

休職之後，立刻就有許多報紙上的言論爆發出來，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取消國家對

於國家財源和事業的「管理權」的呼籲。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時候，因為有了那四年戰爭之後發展出來的周密的組織方法，全國生產的能力比較一九一四年的情形已有進步。政府本可以將這種能力拿來應用到工業的和社會的改造事業上面，將大戰期內的實驗加以推廣和擴充，並且將這些實驗的成績適用於建造房屋以及預備有用貨品和有利的公眾事業這幾方面。但是事實上却不然，一切國家生產的組織都在最早最早的時便破壞了。私有工業經營的人馬上就要求恢復他們的特權，而且多半都是受新聞界的熱誠贊助。當時政府裡有些官吏本是曾經出力使大戰得到勝利結局的，那些報紙要求政府取高壓手段，制止商人對於各種切要的商品居奇和貯積，這些官吏大概正是政府應這些請求而委派的——各報却發表種種的攻擊言論，說他們是「白宮的寄生蟲」，是有意作對的人，只顧死守他們的「巢穴」和薪俸，各報將關於這個問題的「事實」報告給大家的時候，這種攻擊言論便是主要的宣傳方法之一。因為這種結果，那些國有的工廠，船塢，和船舶便都賣與私有的商家了，那制止商人包攬的貨價與方法

的精密辦法是國爲有國有工廠纔能實行的，從此也就破壞了，後來甚至弄到一個危急的時期，和大戰時期一樣，連糧食部都要勉強撐扎着纔能維持牠的生命。關於這個問題的要點並不在官有和私有的效率之比較如何，而在新聞界之不顧大家依照這個問題實際的利害來決定他們的意見——他們把一方面的首領說成偽善的慈善家，一舉一動都要爲那乖謬的政府機關的官派所阻遏，另一方面的首領他們便說是『寄生蟲』，惟一的目的便是死守那發財的位置，不顧國家能率的損失——新聞界之持這種態度纔是個問題的要點(註)。

(註)若要研究關於這點的事實，可看柳孟內爵士著的國有之成功一書。(Sir Leo Chiozza Money's "The Triumph of Nationalization")

反對一九一八年教育改革案的運動也是同樣的不顧事實，偏重那不切實的抨擊言論。這時候『寄生蟲』這三個字已經不新鮮了，於是又造出了『浪蕩子』這麼一個名詞；經濟之講求便極一時之盛。言論界都以國家當前的財政困難爲理由，不論各種用費的

目的何如，一概加以否認，『教育改革案』便是他們認為一種浪費的建議，說是徒然取去納稅人民口袋裏的錢，因此這項計劃也就終歸擱置了。我們只聽見各方面都說教育上增了一筆『絕大的經費』。其實自一九一二年以來，物價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而教育經費却僅增百分之八十六，這種事實卻不曾聽見提及。『教育改革案』裏所增加的經費總額還不到一千萬鎊（註一）。攻擊的人却說是國家本已窮困，不堪這種奇大的需要。其實只要拿一隻戰艦的費用，便可以應付這筆經費，他們對於這種事實又是不管。那一派『反對靡費』的人只知蔽於中等階級的偏見，力辯他們那般受困的納稅人起來反抗之合理；後來都佛方面的普通選舉以政府靡費為惟一的爭點，雙方競選，這派人便說那是『節儉的管家和浪費的官吏之間的競爭』，認為政府黨候選員之失敗便是『管家』方面的勝利（註二）。那『興登堡戰線上的浪費』是非費不可的，全國的青年因此所受的犧牲都不管牠。泰晤士報對於都倫的選舉競爭是由婦女的投票決定勝負這一節，非常注重，說是婦女雖然對於通常的政治之爭平時多半不注意，但是對於那用費



浩大的預算案和陡增賦稅的意思却是「自然而便了解了」，知道這種事情以後一定要影響到她們的日常用度。所以新聞界所鼓吹的大半都是這種「自然而然的了解」，至於先明了真相再下判斷，他們却極力的阻止，不使實現。

(註一) 見一九二二年二月份的大道所載唐內君的論文。

(註二) 見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五日泰晤士報。

一般的民衆還在爲那戰時的感情作用所激盪的時候，「反俄」的論調大概是最合大家的脾味的，而且關於這方面的消息最容易信口捏造，所以大家更易受其蒙蔽。至於俄國在工業平民化這一方面所行的空前大實驗，各報却故意不令大家知道，爲的是要造成大家對於這個新仇敵的仇恨心。對德的戰事停止以後過了幾個月，英國兵大殺俄國的農民，英國兵船將他們封鎖起來，使他們餓死；這些行爲，誰也不知道爲的是什麼原因。在對俄取干涉政策的時期之中，種種的消息都無非代表那般辦報的人的希望和恐慌。他們這些人爲了主觀的原因，似乎是相信舊黨黨徒和代表告訴他們的消息以及

政府管理的通信機關供給他們的新聞材料，而不自行調查事實。關於俄國狀況的全部事實是很複雜的，要想完全調查清楚自然是很難辦到；但是各項新聞材料比較的可靠成分是可以考驗出來的，各報對於各種消息是否確實，加以辨別，這是可以辦到的。譬如吧，一九一七年的夏天俄國軍隊是否願戰；蘇維埃政府是否願與德國單獨媾和；一九一八年俄國的人民是否真正歡迎各協約國聯合干涉的行動；高爾察，鄂尼金和俞登尼支他們的軍事行動是否得到勝利；和平會議的時候，蘇維埃政府對於和平的真正態度究竟是怎樣的；波蘭人舉兵反抗的行動究竟是非曲直若何——這些事都是大家非知道不可的。但是凡是關於這些問題的消息，即令不是有組織的宣傳，也都帶有誤錯的樂觀態度和隨聲附和的色彩。譬如有了『與慘殺携手』這類捕風捉影之談，大家便認為與赤黨發生商業或其他關係是談不到的問題，以致無論什麼人，只要主張恢復這類的關係，便要生出道德上的污點。新聞界告訴大家的消息都是與事實不符的，因此民衆對於那些影響及於千百萬無辜人民的命運和俄國與歐洲一般的未來社會組織的種種

政策，或則贊成，或則漠不關心；其所以弄成這種情形，便是因為到了那種絕大的危急之時，他們不能得到極少量的真確消息。他們本是應該知道確實的情形，新聞界本來也有供給確實消息給他們的責任。

這類造謠作用的動機，至少有一部分是很明顯的：資本家對於圖利的場所是不願意有甚麼限制的；他們痛恨那些拿去「教育他人子女」的賦稅；並且資本界的全體看見那反資本主義的實驗有相當成功之勢，當然是決意不容牠實驗的。

這種反俄運動，即令以中產階級社會的觀察點看來，也是太幼稚，太沒有眼光；這似乎是無須說明的。姑無論資本界的將來是怎樣的，總之，我們若認為鐵路和礦山這些事業可以作為純粹的私人圖利事業，那簡直無異認為我們可以築路造橋來徵收大家的雜稅，以滿足私人的利益，這兩種觀念是同樣的無理。如果中產階級真想尋求合法的發展，他們便應該協力來辨別產業的種類，究竟那些最宜由國家管理，那些比較宜於私人管有和私人經營。至於用來教育那未來的選民的費用呢，凡認為共產主義是

一種危險的人都應該將這種費用視爲免除社會災禍的保險費。歷史上關於干涉他國革命運動的失敗，記載得很多，應該可以作我們的警告，使我們明白我們對於俄國事情之干涉將要引起什麼結果。

私有的資本事業之影響新事業，上面已經說明幾點了。但是其中最有力的幾種方法却非常難於說得明白，因爲都是很奧妙很含糊的。平民階級即令於充分的政治自由之外，還爭得了幾分工業上的自治，也還是可以爲那工業的特殊階級所收買，爲勢利所誘惑，爲低微的社會地位和卑下的心理所誤。

我們若說每日預聞，每日明鏡，家庭預聞和家庭雜記這一類的報紙對於國人的政治見解有很大的影響，這種話似乎太沒有根據。其實牠們所發生的影響真是再沒有更深刻的了。現在的選民差不多一半是婦女，她們對於政治問題的討論或判斷以及政治原則的考慮都還沒有習慣，這種情形，我們還不曾十分看透。「對人」判斷的習慣是根深蒂固的。她們看了每日預聞或每日明鏡，便知道威爾士親王是一個可

愛的小孩子。聽說英國的年青女子每兩個之中必有一個把羅王爾像片放在枕頭底下睡覺。不消說，在大英帝國之內，除了查理·賈波林之外，當然是再沒有比威爾士親王照像更多的男子了。他已經「迷住了所有的人心」。他的母親便是全世界作母親的模範。甚至有一位工黨領袖還說他自己是一個共和黨哩！這一來簡直要使工黨損失五十萬張選舉票。現在我們關於親王的婚姻問題已經就討論起來了。大家便說他將要取維新的態度，娶一個皇族以外的英國女子，表示國家主義和平民主義的勝利。這些事情在那千百萬看畫報的人看起來，便是政治的要點，是新社會組織的問題了。

現在的羣衆之組成社會是以不平等的原則爲基礎的，這些報紙實際上便是天天極力宣傳，以博這般羣衆的贊助或順從——他們縱或不是有意的作用，但是所發生的效力却不因此便不大。他們不僅使那千百萬的民衆習於那不平等的觀念，認爲極少數的人所組成的特殊階級是應該佔着一種有勢力的，受特別教育的，受人敬仰的特殊地位。只要使大家心理習於那不平等的狀況，認爲這雖然不是大家所希望的社會組織，

却是尋常的，必然的狀況，其餘便好辦了。關於人生幸運的記載也許有一天能使那社會新聞欄的貪心讀者生出許多空中樓閣的夢想。工場裏不是也有勞工界的人的妻成爲『某夫人』嗎？不消說，反對平等之說的偏見便要產生出來。辯護舊社會制度的人們便算得到一半勝利了（註）

（註）有時候這類宣傳作用是比較更有意的。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紐約泰晤士報很得意的記載美國有幾個合組的報章被利用着『說服工人，不使流於過激』。阿甫頓·信克來氏在他的The Brass Check一書裏面說道：——

『報紙上給婦女看的那一部分實在是想得最妙的幾部分之中的一種，因爲他們認定家庭的影響是足以防止男子，不使他流於過激的。這類的出版物大半都是由郵局寄到工人的家裏去，使他們的妻首先得到暗示。在這一種雜誌裏面，給婦女看的一欄裏差不多都是說的關於嬰兒的事情……』

『你即令拿顯微鏡來看，也幾乎看不出有什麼宣傳作用，其實却是有的。這種作

用是隱藏在裏面的，而不是顯然露之於表面。你看去盡是些譬喻，簡直不露痕迹的。』(阿甫頓·信克來在The Brass Check裏面引的話。)

◎ ◎ ◎ ◎ ◎ ◎ ◎ ◎ ◎ ◎ ◎ ◎  
就一般而論，資本主義的報紙對於造成民意的關係很可以從下面這種情形之中看出來：文化史上逢着那些最嚴重的危機的時候，只有靠民衆能得正確消息纔可以補救，但是我們這苦心造成的，費用很大的傳佈消息的機關——所謂新聞界——却不僅不能將確實的消息告訴我們，反而成爲一種絕大的障礙，使大家對於真像無由得知。我們一次又一次的發覺我們自己爲那苦心經營的有組織的造謠行爲所支配（這種行爲也許不是完全有意的），這並不是由於我們自己有這種意思，而是由於各種社會的和工業的勢力於不知不覺之中產生出來的結果。

當初歐洲的大災荒威嚇着全洲許多區域的時候，本可以辦到有效的具體的援助，當時有許多英國專家，行政官，法律家，官吏，銀行家，實業家，著作家，牧師，和

其他的人，組成所謂災荒賑救會，極力要把關於災荒的事實使大家知道：這件事儘便可以作爲說明上面那個問題的一個特別例子。關於那些事實，現在是誰也沒有疑問了，但是一九一九年的時候，却因爲新聞界只顧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便設法掩飾事實，以致大家始終處於五里霧中，對於真相毫不明瞭。一九一九年的秋天，災荒賑救會召集專家會議，被邀到會的有英國法國比國意國和美國向來從事賑災事業的團體裏面的人員，或是屬於討論經濟問題的最高經濟討論會和各種協約國國際委員會的職員。當時因爲那個問題之中，以歐洲中部的數萬萬人的問題爲最難解決，所以會中便要得到關於那部分的情形的直接報告。到會的有兩個德國人和兩個奧國人，在英國代表方面有最高經濟討論會的威廉·比斐利治爵士，代表英國政府調查德國情形的史達林教授，有大戰期內作財政部顧問的梅拿得·鏗士君，還有各合作社的領袖巴莫爾爵士，以及其餘的人。凡是聽見過這些人的報告的，對於當時情形之嚴重決不會再有什麼疑問。他們所討論的也許是當時世界所逢的最大最緊急的事情；他們首先顧到人類的痛



苦，使大家明瞭『文明的破產』這幾個字的意義。但是誰聽了他們的話，至少必能感覺幾分安慰，以為大眾終於會要明白種種的事實，因此也就會贊助那種必需的救濟辦法。新聞界有了電報，有了通信員在全世界各地，有了插畫的方法和醒目的標題，定能使大家心裏對於實際狀況得一個活現的印象，由此便可以靠着大家慷慨熱心的努力，稍減從前的恐怖。各種的問題，如籌募國際借款，如法國的煤荒對於德國運輸停頓的關係，如藉合作社的力量恢復對俄經濟關係，終於會在報紙上為大家所研究，只待事實使大家知道了，便會得到大家的同情，起來援助。

這本是受大家歡迎的新聞界為人類盡一番真正的義務的機會。但是牠是怎麼盡的呢？

各報上關於那個會議的消息佔了許多篇幅。有幾天裏每日郵報和一兩種別的報上最重要的地位都是登的這方面的消息。下面這種大標題便可以代表每日郵報所發表的關於經濟會議和牠所要解決的問題的消息：——

盜牛的德奧人。

德國人與乳牛。

牛代表。

他們所偷的牛。

德國嬰兒營養很好。

法國嬰兒應受公平待遇。

請問，『被盜的牛』與煤荒，運輸，航業，原料，債權，金融，合作社，以及這些事情對於恢復我們自己的工業的關係有什麼相干呢？這個會議難道討論過牛的問題嗎？實在是絲毫也沒有討論牛的問題的意思；該會所考慮的事項，除了有一位發言的說及報紙宣傳錯誤消息時，提到牛字之外，自始至終並不會提及牛的問題。若不是爲

了這些標題的原故，簡直就不會有提到牛字的機會。當時的情形怎麼樣呢：協約國和敵人境內因凍餓而死的人比較戰時死亡的人還要多若干百萬，工業和政治隨之凋敝，這些事情對於我們國內的財政和工業都有密切的關係，但是那成功最大最受歡迎的日報記載這一類事情的時候，這幾種問題簡直成了一件事情：『德奧人把牛偷去了』。關於這些問題，那每日銷行百萬的報所容許大家知道的，事實上不過如此。一種政治和經濟的問題便被他們變成了這麼一件簡單的事，只說卑鄙的德奧人將法國人的牛奪歸己有。報紙上發表這種問題的消息，本是好的而且有用的，但是大家看了這樣的記載便模模糊糊的聯想到敵人在軍事時期的罪惡，認為德奧人無非是可恨罷了。

因此關於這類問題，新聞界不但不會將事實告訴大眾，並且還有意造成一種不良的心理和感情作用，使一般人根本不耐煩明瞭事實，這種心理狀態造成了之後，便使一切的事實沒有走進一般人的腦子的機會。這種作用究竟居心何在呢？新聞界爲什麼要用這種手段來作惡呢？這些新聞記者和報館主人並不是怪物。他們對於他們的國家

的福利並不是漠不關心；我敢斷言他們也切望有爲公和愛國的精神。然則究竟應該怎樣解釋呢？

有一點我們必須記着的便是他們都是謹慎的從事圖利的人，受託管理着很值錢的產業。天天都是各報彼此不遺餘力的競爭。一般的人天天都是幹的乾燥無味的職業，所以一種報紙要賣出幾百萬給他們，便非有趣味不可。譬如有一種報紙發表關於國際經濟會議的消息（這個名目便糟糕），專說什麼金融和債權問題，以及煤荒和大陸運輸這些事；另有一種報紙却把這些沉悶的消息變成一種驚人的「德與陰謀」，大戰所激起和助長的感情作用後來本已漸漸消沉下去了，這種報紙却大事鼓吹，說國內國外有許多壞人，使那種感情作用再向他們發洩：這兩種報紙以興趣方面而論，在那些疲乏的書記，管家婦，汽車夫，和電車夫看起來，那一種能受歡迎是不消說的。這種造出許多壞人的手段並不是偶然的；實在是因爲要迎合一般人的心理，使大家愛看，所以不得不如此。試看通常那些受歡迎的戲劇和電影的性質，便可以明白了。新聞

紙這種行爲對於大眾的利益是毫無關係的。有時候新聞業爲適應牠的需要起見，簡直就不得不過分的尋錯。歐戰期內有一個晚報發表一個駭人聽聞的消息，說是朋友會實行供給內地德奧兩國兒童的衣食——英國婦女的童兒却多半不僅缺少衣食沒有人管，而且鄰舍們和朋友們都以最下等人對待他們。誰若見了這種消息，當然不會以爲這派人這種行爲足以使戰事發生多大困難，或使西方戰線發生危險；也不會認爲照應照應那些無家和挨餓的兒童，便有損國家的名譽；當然只能承認這種行爲足以表現我們的俠義精神與普魯士人不同，而沒有什麼壞處。但是剛纔所說的那個晚報却把這種行爲說作一種『應加制止的恥辱事』。凡是將挨餓的兒童帶到家裡去的人便是犯了大罪，被那個報上罵爲『庇護德奧人的敗類』。（這種名目差不多和『牛代表』一樣的取得獨出心裁。）這些『壞人』一連遭了幾天公然的辱罵，被稱爲可鄙的和平主義者和國賊，受盡了譏諷和詛咒——我們這些非常有德性的民衆都感覺無量的痛快，因爲這個罵人的報是自誇爲銷路很廣的。我們當然不能說那些高貴的報館主人特別喜歡將那些

從街上帶回挨餓的兒童的善人視爲『庇護德與人的敗類』，因此便愛攻擊他們，所以我們只好認爲現代新聞業有這麼一種需要，不得不如此的。

但是我們要注意這種行爲的影響。前面已經說過所謂『心理的格列商法則』這裏正是這種法則實現了。假使有一種報紙不是這樣，牠與別的報競爭便要失敗。因此刺激羣衆這幾種感情作用的手段便成了成功最大的報館主人或編輯的一種自然的本能。這種人甚至還要振振有詞的自己辯護，說這種新聞業的吹鼓作用是很合乎道德的。大家都愛聽的話，怎麼會是錯的呢？民衆的意旨不就是上帝的意旨嗎？

賣淫褻文章的人所利用的那種人類天性，其中也有人類的生命力存在，所以我們也未嘗不可以承認那些報紙所利用的羣衆感情作用有一部分足以代表上帝的意旨。在這些感情作用之中究竟還隱藏着純粹道德的忿怒，人羣團結的天性，足以表現人類合力負責的精神和善惡有報的公理觀念。但是這些本能作用是半盲目的，毫無訓練的，所以決不能領導人們的行動。譬如一個患傷寒的病人是吃了東西便要致命的，所以使

他切望吃東西的饑餓作用當然是於他不利的。那麼，如果各國的人當真「非明白一切事情的真相便要滅亡」，如果我們這種社會組織之中有許多有勢力的圖利事業爲了要達圖利的目的，便不得不彼此競爭着利用羣衆感情作用，不容大家知道絲毫的事實，我恐怕我們這裏和其他的任何地方都陷入不幸的境地，巴特刺那句荒唐的話——「人類將要被牠自己所造成的制度所毀滅」——大致便要實現了。

## 第五章 現今制度之下可以實行的改良方法

現在這種工業化的新聞事業的毛病固然很大，但是有了前面所說的理由，也就可以知道新聞事業若由國家專管一定更不堪了。我們現在爭自由的第一步條件便是要脫離那種專制，倘若新聞事業歸國家專管，那就馬上回復到那種專制的狀況了；那樣一來，便要恢復一種知識方面專制的工具，和天主教對付異教徒的裁判所一樣的壞。政

府方面因爲從此得不到真正的批評，能率必定降低，民衆方面因爲少數派從此不敢說話，關於種種問題，大家不能切實的討論，人們的知識生活也要從此減少生機，所以民衆的自治能力也就不能發達了。

既是這樣，我們向那一方面尋求解決的方法呢？

關於這個問題，我要提出一種回答，並不是所謂烏託邦的理想解決法，而是指出現在的工人們能力範圍以內所能作到的辦法，並不必對於現在的社會有什麼根本的改組。

但是在提出這些具體的主張之前，還要提醒讀者，不要以爲改良或改變現在這種情形必須絕對的走一條路。即令在一個烏托邦裡，私人管有的出版事業也許是不僅能得承認，而且能得鼓勵的。說到這裏，我覺得應該想一想，私人管有的出版事業爲什麼是健全的社會所應有的成分，（這種出版業自有合股公司的新聞紙以來，便不存在了，這點已於前面說過。）這裏所謂「出版事業」是包括一般印刷而言——書，小冊子，



定期刊，每週評論，小頁文字，傳單，招貼，通告。若是個人利用這些東西作發表個人思想的工具這種權利不能保留，我們便把言論自由的原則根本拋棄了，便成了禁止政治的合社會的異說，和從前禁止宗教的異說一般。那就回到『出版物清一色』（註）的時代了。

（註）天主教壓制異教的辦法之一，凡出版物在被禁之列者即不許大家讀，或只許讀刪改後的版本。

不消說，歐戰期內英國和美國都回復了那種情形，那般自由黨人隨隨便便就決定了耶穌登山訓衆的話很可以認為煽惑人心的政治邪說，依照『治安法令』是要加以取締的。在美國呢，（在英國也有幾分相同，）這些勢力使用來壓制共產黨的宣傳；美國壓制國際工人聯合運動的手段尤其嚴厲。共產黨人對此也沒有什麼要求：言論自由顯然是談不到的。共產黨人對於莫斯科方面指示他們的途徑已經表示願意隨從了。

關於『自由言論』這個問題，歐戰期內的『中產階級』社會和後來的共產黨革命的全

部經過又把從前歷史上業已充分表明過的一種特點再表明一番，這種特點便是：自  
然人不喜歡言論自由；因為自由的言論使他的信心動搖，使他發生從來所沒有的疑  
惑，強迫他勞心思慮，使他陷於那不痛快的地位，不得不聽人家說他的錯誤，說他的  
意見可笑，以至說他是個蠢人。這些話誰愛聽呢？但是言論自由却非如此不可。

大家對於思想自由至今還沒有明瞭，也沒有實行，這是因為我們還不會看出牠是  
一種極端不痛快和不自然的東西，却自命為愛這種精神。我們必須認識言論自由的真  
面目——必須知道牠是一種極不令人痛快的訓練工夫，很足以觸犯我們那些最深的本  
能，但是要想造成充分的社會智力却非此不可——必須有了這個條件，纔能希望在社  
會主義之下實現思想的自由。有了這種基礎，我們便可望實現密爾所謂「一切自由之  
上的自由」——「隨便依照良心而知，言，辨的自由」——並且可以將這種自由變為實際  
政治運動方面可以應用的元素。

因為我們知道「言論和出版完全自由」的原則太空泛了，實際上不能應用——這種

道理我們有些人知道了便隨處上當。報紙並不應自由誣謗他人，發表捏造文字，或公布軍事機密，演說家也不能拿他的口才在中午時候斷絕國家銀行的交通。所以我們必須加以限制纔行。既要加以限制，我們便可以取締我們所惡的自由，至於那些自由的根本立腳點，我們却從沒有費心求個瞭解（註）現在要從事建設新社會的人萬不可像美國憲法似的，只顧弄出許多高大有力的原則，事後却因為那些原則完全不能應用，便毫不注意實行；他們應該顧慮到社會進化之不可阻滯，所以不如費點苦心，想出切實的辦法來，達到最低限度的言論自由。

（註）按美國憲法的規定，『國會不能制任何法律……限制言論和出版的自由』。但是後來通過『偵察條例』的時候，國會却沒有感覺絲毫憲法上的困難；其實那種條例和近代普魯士所通過的出版法令比較起來，當然是同樣的嚴厲（參看第六頁註）。

從前有許多人都想找出一種方法來，使限制言論或著作的合理限度有一種標準。關於這種努力，這裏不是討論的地方。也許根本就找不出這種方法。（若是這樣，那就

更不得留神我們那壓制自由的趨向了。)但是憲法上若是規定相當的條款，制裁民意的發表，不僅於自由無妨，還能有所補助；這是可以深信無疑的。

現在所行的禁止誹謗他人的法律固然是毫無限制，但是大體說起來，實在比法國或美國類似的法律不知道強到那裏去了。不過我們還可以把法國曾經實行過的「答覆」辦法拿來補救補救。這種法律的大意便是被報紙攻擊的人有在其被攻擊的範圍以內加以申辯之權，(這種申辯還是在攻擊的文字同一地位，用同一印法發表)。這種辦法甚至還可以擴充於政府，使政府也能享有這種權利。

關於這一點，很有人提出種種的提議。蘭頓·達維士和海華兩君所著的一部有用的小書——平民政治與出版事業(全國勞工出版部出版)——很可作讀者的參考，那本書裏面便提出了兩種提議。第一種是卡納德君的主張，大意如下：——

「由『新聞真實法令』明白規定，凡新聞之違犯事實者無論是直接的或間接的，都是犯罪行為，應受處分。無論何人認為某種報導與事實不符，便可致函該報社。」

餉報紙，同時通知一特設的「出版業管理局」。若是那假報紙承認不符事實，（無論是偶爾的錯誤或是故意造謠），便要在相當日數以內加以更正，其更正的標題應規定用半英寸的大字。若是牠不承認有什麼不符事實，這種案件便歸法庭辦理，法庭將所有證據受理之後，便由普通的陪審團判定有無消息不確或錯誤之處。懲罰的辦法可有下列各條：

第一種罪——罰以資本全部十分之一。

第二種罪——罰以資本全部十分之二。

第三種罪——罰以資本全部十分之三並禁止出版一月，及其他。

此外，每種報紙必須明白的印出辦報的主人或管理的股東的名字，這些人所辦的或管理的其他報章或定期刊物的名目也要通通登出來。

實行這種法令若不留神，不免要發生毛病，這固然是應加注意的，但是辦報的人知道了登載不確或錯誤的消息要受罰，當然很可以減少新聞界那種不小心和不負責

任的行爲了。』（第四十三頁）

第二種提議是查理士·華爾士頓爵士的：——

『出版法應該修改的不僅是要增加新聞紙傳佈任何不確消息的直接處罰，並且還要規定立即更正那種消息的辦法。各報一經接到誤登消息的通知，便應毫不遲延的聲明道歉並更正誤登的新聞。這種道歉和更正的聲明立刻便應發表，極力使牠有效，如有遲延，再起訴訟時便應增加罪狀』。（第四十四頁）

總之，政府關於募兵和募款這類事情是要利用新聞紙的，這種情形，工黨政府大概還有遇到的機會，牠和那對敵的資本主義報紙奮鬥的時候，要將牠的政策公允的發表出來，便非利用新聞紙不可（註）。

（註）大家想必還記得，有一個時期北岩爵士的報不肯發表政府招兵的廣告，因為北岩爵士認爲政府應該已經實行徵兵制度了。所以除非事先有相當的法律規定，工黨內閣便不免受對敵的報紙的抵制，不登工黨的消息。

「新聞真實法令」當然也要應付下面這類困難：「譬如有一種搗亂的報紙有意作反對國有鐵路的宣傳；這種報紙上一定會天天登出所有的遲到火車；凡有意外的事牠一定故意張大其詞；每天一定要發表讀者的來信，說脚夫如何無理，職員如何不稱職。這種消息，那怕幾星期也是有的，並無須捏造。那麼，這種報紙上所登的既是日常發生的事實，法律怎麼能懲治牠呢？不消說，這種只攻擊一方面的手段是要發生很不好的結果的。這類報上所記載的事情在鐵路未曾收歸國有以前，也是一樣；報紙上把這些事情發表出來，大家看了便要因此認為鐵路收歸國有以後纔有這些毛病。但是法律對於這個問題究竟應該如何對付，真是難於想出辦法來。」

此外還有幾種提議是關於禁止社論不署真姓名的，認為報紙上必須載出報館主人，經理，和編輯人的姓名，並且社論必須載明作者的姓名。這些提議也許多少有幾分價值，但是這種機械辦法終究是沒有很大好處的。

於是我們便想到國有報紙的辦法，這種機關報是由政府辦的，但是並非一種專利

事業，或完全的代替私人管有的報紙，不過是作私有報紙的補助罷了。

前面分析過的許多新聞業的毛病大部分是由於私有資本而產生的，但是我們即令採一種理想的解決方法，也不能因此便不許私人管有的出版業自由出書，出小冊子，傳單，定期刊，招貼等等，這種道理前面已經討論過。同時我們也不能不承認『國有報紙』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部分辦法：國家享有出版事業的專利權固然不免成一種新式專制的開端和基礎，較之從前一切宗教上的專制還要糟糕，但是作個補助方法是可以的。若說為保持多數人意見的健全起見，應該使少數人有發表意見的機會，那自然不錯，但是這種目的同時也要多數派——政府——同具這種便利纔能達到。欲求大眾判斷力之健全，無論如何是不能否認一個管理得法的『政府公報』為解決辦法之一部分的。但是我們要承認這種辦法，必須首先使此處所討論的更根本的提議可以實行。那種根本的提議便是：新聞事業的職業地位必須加以根本的改變，應該給牠一種與法律和醫藥的職業地位相似的地位纔行；總之，要使牠成爲一種必須相當法定資格纔能從事的



職業。這一層作到了之後，經理國有報紙的職務不可交與那專對政府當局負責的政府機關，而要付託於一個佔有與司法機關相類似的地位的機關——換言之，便是不依靠政府的機關；讓牠見到事實是怎樣便怎樣說出來；這個新聞「裁判機關」裏面的人員

便從新聞界裏挑選出來，他們便依照大家所認為新聞事業之基礎的原則行事。

現在我們首先要討論討論，究竟將我們給予法律和醫藥的職業地位拿來給新聞業，所含的意義是怎樣的。

關於這個問題，華爾特·黎甫滿君曾經說過，現在把他的話引在下面：——

「審理案件時相信種種的憑證，先有許多防禦的方法，這是由於作證人的常不可靠，陪審官也多存偏見，有了這種長久的經驗纔知道防備。我們認為這是人類自由的一種根本之點。但是關於社會上的事情却是危險大得多了。千百萬人的生活關鍵在此，人人的命運關鍵在此。全社會便是陪審團，不僅包括那些有投票資格的人。凡是造成羣衆心理的人都在陪審團之內——隨意談天的人，漫不經心的說謊話

的人，天生愛說誑語的人，腦經不健全的人，趨炎附勢的人，搗亂的人，無所不有。無論什麼憑證，無論是那一種，無論是那一個匿名的人說的，只要落到這些陪審官手裏，他們沒有不信的，並且還不考究是否可靠，是否可信，作假證也並不受罰。假使法庭審案的時候說句誑話，牽及我的鄰舍的牛的命運，我便可以因此入獄。但是關於和戰大事我若向百萬的讀者說誑，我儘可以說個痛快淋漓，假使我所用的說誑的方法用得好，還可以全不負責。譬如我說了關於日本的誑話，誰也不會處罰我的。我儘可以說個个日本的僕役都作了預備隊，個个日本的藝術品陳列所都成了準備戰事的地方。我却是無罪的。假使和日本有什麼敵意呢，我說誑更說得多便更受大家歡迎。我若是說日本秘密的喝小孩子的血，說日本婦人不貞潔，說日本根本便不是人類的一支，我敢信大多數的報紙一定極願意發表我這些話，全國各地的教堂裏也一定有人願意聽我演說。其所以如此，只爲了一種簡單的原因：羣衆只靠聽別人的話，又不知道要加一番證實，所以他們的行動便只能隨着他們那好爭的心

理和他們的希望而轉移了。

供給新聞的機關之發展是毫無預定計劃的，我們不能將新聞真實的責任歸於那一部分。因為工作的劃分愈複雜，新聞業的組織也就隨之劃分愈複雜。一端是目錄事實的人，一端是讀者。在這兩者之間便是那規模很大用費很多的傳達和編輯的機關。有時候這個機關所作的事情真是很妙，令人驚奇，尤其是當牠報告某個運動會的消息，或是一個橫渡大西洋的飛行，或是一個國王的死訊，或是一次選舉的結果，那真是快得可驚。但是每逢複雜一點的問題，譬如某種政策的成功，或是某個外國的社會狀況——換言之，就是那一類可以含混的問題，真正的答案既非「是」又非「否」，却是兩可之間的——逢着這種時候，那報告消息的分功作用却弄出無窮的錯誤和誤解，以至於有是非顛倒之事了。（註）

（註）由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大西洋月刊裏面的一篇文章轉載出來的。

他的意見便是認為在新聞事業若不能造成一種專門職業的地位，至少與醫藥和法

律一樣高，那就不過是一種社會的廢物罷了。

所以新聞事業必須成爲一種專門職業，需要相當的智力方面的最低限度，至少要稍稍知道『確證是什麼』纔行。黎甫滿君論到這個問題的這一方面時，曾說

『新聞事業的勢力如此日見增加，同時必須隨之有一種專門的訓練，客觀調查的理想便是這種訓練的主要成分。新聞業向來那種輕傲態度是必須拋却的，因爲從事新聞業的人真正的模範並不是那些隨隨便便找消息的機敏的人，而是那些肯費苦心調查世間真象的，具有科學精神的，忍耐不畏難的人……正因爲新聞是複雜而易錯的東西，所以好的報告必須運用最高的科學本領纔行。這類的本領第一便是不使一種消息可信的程度過於牠所擔保的，其次是推測未來趨勢的精密頭腦，再其次便是敏銳的眼光，務必能瞭解各種事實的分量上的價值纔行。無論那一個觀察家，你只要看他是否誇張他自己的消息之可靠，便可以看出他大致是否可靠了。假如你自己沒有事實和他的消息比較，最好的省事的測驗法便是仔細觀察他是否覺得出自己的

缺點；觀察他是否明白他自己只知道他所描寫的事情的一部分；觀察他是否有背面的瞭解，和他所認為已經明瞭的相比較。

這種懷疑精神當然是無論那一種訓練工夫都必須具有的。但是各種不同的職業便應分各種不同的訓練方法。譬如充分的法律方面的訓練便是充滿了這種精神的，但是這方面的懷疑精神是趨向於從事法律的人所研究的事情的。新聞記者進行他的工作却不是同樣的情形之下，所以也就必須經一番不同的專門訓練。至於他怎樣纔能得到這種訓練，那當然是一種教育上的問題，必須對於證據上的種類和記者所接觸的消息來源加一番歸納的研究，纔能解決。

將來必有一日，大家都完全明瞭公眾意見在社會上之重要，那時候學者們便會毫不遲疑的作文章討論證據問題，給搜集新聞的機關作參攷。現在簡直就沒有這種的文章，因為學者們有一種古怪的偏見，認為不合理的現象是不十分值得認真研究的，政治科學便受這種偏見的壞影響。（註）

(註)見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份的天南洋月報

但是還是非要一種法規不可。假使有一種新聞業的法規，體面的新聞記者覺得爲維持尊嚴計不得不贊成，那麼，現在大家視爲當然的常發生的事情也就有許多不致於發生了。假使一個新聞記者對於他所記載的事情從事證明實際發生的情形時，也和見證人在法庭裏作見證一樣的鄭重，假使他宣布判決的時候也和一個法官對於一個罪犯宣布判詞一般的鄭重，這本書裏以前詳細論及過的代表我們近代新聞事業的那一類事情恐怕也就沒有實現的可能了。(不消說，一個新聞記者的判案以社會的重要而論，比一個法官的判案不知大到那裏去了。)

我們若有了這種初步的條件，便可以希望一種國有報紙的辦理情形和我們辦理一個法庭一樣，由一個新聞業的裁判團主持，他們便擔保以各種事情的眞象告訴大家，也是那麼慎重，和一個法官擔保施行法律並使正義保持平衡一般。辦理一個國有報紙既是一種偉大莊嚴的公事，並且還包括着新聞事業的尊嚴和體面，大致也就可以成爲

一種以真象告訂我們的工具了。我們只要看法庭的辦理情形，似乎便可以因此存着還個希望，認為這種事情並不是不能作到的。譬如我們從某一個政黨裏面找一個人出來，使他作個法官。他當然有時候不能不出庭審判他的政敵。但是我們知道隨意偏私的危險是很少的。因為法律上明白的規定着關於證據的法則，那是非遵守不可的；這些法則是根據兩種並立的原則而成，一是人類作證的極易錯誤，一是凡一事件必有反面的報告。一方面有一種很高的職業的法規必須遵守，一方面又有一種職業的尊嚴必須維持。只要經濟方面完全獨立，毫不動搖，這兩種作用當然也就不會不完全有效了。就事實而論，這兩種作用在法庭方面大半是有效的。惟有戰時牽及了愛國思想的時候，英國的法官也許有侮慢證據和明顯的事實，並從而得意的行爲（註）。關於法律方面的事情，其本身多半是非常之無意識，殘忍，不平，但是我們在法律的施行方面通常還算能作到很謹慎的地步，足見我們要想養成一種新聞的裁判所，使牠擔保將真象告訴國人，將那全國日常的討論和國民心理的發展以及社會狀況的健全所依靠的一

切具體的事實報告出來，那一定是作得到的。

(註)莫列爾君被一個週報把他說作一個『受普魯士津貼的奸細』，因此提起訴訟的時候，新聞界的人便大家都說他簡直就莫想得到一道判詞，最好的結果也不過得個『不值價』的判詞，但是他如果是個普魯士的奸細，政府當然有將他逮捕和槍斃的責任。後來他被捕了，判了六個月的監禁，爲的却只是他的小冊子文章寄了一份給僑居瑞士的羅曼·羅蘭！

我們若說我們的道德和智識的沿習之中沒有這種社會機關的基礎，那真是太無見地的悲觀。要知道我們在法律和科學方面便有這種的傳統，只要應用於報告新聞這件事情上面，便可以使我們對於種種公衆事件明瞭其中的真象。一個新聞『裁判官職』對於官家報紙上所發表的消息負着不偏袒和真實的責任，這種職務必將很快的成爲一種異常高尚的地位，具有一切受人尊敬的傳統，猶之我們那些其他的，裁判職之受人尊重一般。



倘若我們對於言論自由的態度並不是基於一種愛言論自由的虛偽心理，而是出於切實的瞭解了言論自由的社會需要；倘若我們之視牠一如我們之視法律，那麼一個「公報」——即由公家管理的報——便可以成爲報告新聞的一種切實方法。誰也是不愛法律的；但是我們都知道我們非有法律不可；都知道牠是一種主要的社會需要；都知道誰者是不顧法律，違反法律，便是自私的容許他的本能作用不受理智的裁制；都知道法律的條文無論如何討厭，我們還是非大家極力的擁護牠不可。

我打算在這裏作兩種主要的提議，作爲勞工政府改良我們現在這種工業化的新聞業所產生出來的狀況的辦法。第一種提議便是凡有關於「基爾特理想」的長處，譬如我們看見牠在法律和醫藥這兩門職業方面所表現的，都應應用於新聞事業。辦到這步之後，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便可以安然開始實驗國有報紙的辦法（但國有報紙並非國家獨斷事業），其管理權並不操之政府，而是操之一個特殊的團體，他們對於行政部分的關係和現在的司法與行政的關係一樣——是根據許多原則和標準而成的並立的權力。

在這種新聞裁判機關裏任職應當視為很榮幸的事，應當視為新聞界最大的獎勵。在這種機關裏任職的人除負責任而外，還應享有榮譽，高俸，和养老金。這種人員必須是新聞界品格過人的人，必須能將時事的真象搜集起來作公衆意見的參攷。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想對於公衆事件的事實宣布判詞，無畏無偏，當然是可能的，這正猶之法官在法庭裏能夠對於他所審的兩造保持公平無偏的態度一般。作法官的若是受人賄賂，誰出錢多便給誰勝訴，我們當然要猛烈的攻擊他；這種新聞裁判官若有隨意顛倒事實的行爲，他們也是同樣的要受人輕視的。

## 第六章 勞工政府與資本主義的新聞業

無論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或個人主義持什麼意見，前一章裏所略述的情形之爲社會的危機是不消說的。但是這個問題在力求新制度的工人方面而論，却只限於簡單的一點：假使他們現在的計劃想得點成功的機會，他們非首先開辦一個足以完全說出他們

的主張的報紙不可。工人們努力使各方面實現社會化的理想。資本主義的報紙對於他們這種運動當然不免故意造謠，造成大家反對他們的成見，所以工人們必須自己創辦報紙纔能與他們對抗。一個勞工政府若是沒有這種機關報，當然只有仰承資本主義報紙的鼻息了。牠的政府決不能得到公平的批評；並且民衆對於牠的政策真相，甚至連知道的機會都沒有哩。

現在我們假設一個勞工政府出來執政，就說牠只打算實行牠的計劃的一部分吧。牠首先必遭反對者很劇烈的破壞。勞工階級執政的成績怎樣，當然是由那些有意毀滅牠的人們告訴國人。大家所能聽到的決不是關於成效好的方面的消息，無非是關於不好方面的話。譬如收歸國有後的鐵路上發生了什麼偶然的事情，這種事情便被大家認為收歸國有之直接結果。於是政府便成了殺人犯了。若是在一個供給牛奶的事情由政府辦理的城市裏有一個小孩因為吃了傳染的牛奶患白喉而死，政府便成了殺害小孩的罪犯。若是有了一個工黨的人入了離婚法庭，新聞界便要全體起而大造空氣，使大家

起一種不良的印象，認爲政府有意破壞一班的道德，並且不久便將提出「婦女園有」的提案。若是有一個教書先生因爲傷害了他的學生被登，報紙上便要大登其關於這種學務的驚人消息，說是牠們在新政府之下簡直讓那般膽闊的鬼胡作亂爲了。其實私人管理的時候有時也不免發生偶爾的事件；勞工政府奉執政以前法庭裏面也有離婚的案子；勞工政府奉執政以前市政府管理的時候，白喉症在英國村莊上也並不是沒有見過的事。勞工政府執政以前的刑事案件記錄裏面也有許多教師侵害學生的案件。不過新聞界宣傳的結果，大家當然就漸漸把這些事實忘記了。我們受了現在這種教育，全國的人對於這類問題大多數是不能想得明白的。若想我們全國的人能够看透這類的造謠作用，恐怕非再經幾十年較好的教育不可。在這種情形之下，報紙二十分之十九都在資本家手中，至多只要他們替勞工政府造幾個月的壞空氣，牠的地位便要不能維持了。

主張要辦工黨報紙的人爲說明這種重要意見，每每舉出工黨的條例。對於關於

罷工這種的爭執還是受資本主義經濟變遷之影響的。但是就事實而論，工黨報紙之必要或者不是在罷工的時候爲最切，因爲那種時候的問題對於工人階級的利害關係多半都是直接的，含有強迫性的，所以工人們都是明瞭，無須報紙的幫助；並且大家的討論也很敏銳，足以抵銷幾分新聞紙的破壞作用。有組織的勞工階級以外的『普通民衆』當然是得到錯誤的觀念，這點固然是要顧慮的，但是即令有了一個勞工的報紙，這種情形還是不免，因爲那些人是不会着勞工的報紙的。

這當然不是說罷工的時候勞工的報紙不是一種很大的幫助，不過是說關於和辦勞工報紙最切的需要和最有力的理由都不是發現於那種時候罷了。更須要這種報紙的時候還是在罷工奮鬥的熱心消沉下去之後，工人們回復了平日對於政治問題漠不關心的狀態的時候，那時候舊日的成見又出現了，那固有的惰性便使現在社會上這般把持的人又有機會可乘了。

大多數有組織的工人也和中產階級一樣的囿於種種偏見，現在議會裏的勞工黨有

時候便受這些偏見的恐嚇，因而致於無力應付，這種情形便可以表明一個工黨政府勞於政治工作的時候，反對派便襲出而乘機搗亂，作者在一九二一年頭幾個月裏著這本書的時候，議會勞工黨所遭的情形便可以作一個例。當時該黨因為怕新聞界向選舉造不良空氣，以致不敢堅持工黨政策。工黨經兩年以上的時期，在牠所有的正式政策宣言裏面都宣稱英國要恢復平時的工商業狀況須靠中歐歐洲的復興。在牠關於失業問題的提案裏面便特別注重這點（註一）。牠之主張修改凡爾賽條約也是以此為理由（註二）。牠對於那次的條約是曾經屢次否認的（註三）。政府對德政策也曾屢次被工黨唾罵。在議會方面說，工黨實在是未能按照這些莊重的決議進行，我們只要看該黨每年會會場上的批評便可以明白了。一九二二年三月，工黨却逢着了一個奪回一部分失地的機會。首相提出了那和平善後的全部經過之中最糊塗不堪的辦法——即「賠償要索案」。這個案主張達泰晤士報都覺得太不行了，所以牠一面承認這種辦法將於我們不利，不過因為對於德國的害處一定更大，所以纔贊成。高文君會痛罵這種見解，

說這是「發癲」，爲了要害德國人却先害了自己。工黨在衆議院裏的演說也是表示同樣的精神。於是魯意·喬治先生便站起來說，工黨如果投票反對這個提案，他便要害訴國人，說他們是親德派，當時湯姆斯君便宣言工黨不反對那個提案了，爲的是不願意使他們對德的態度被人「誤會」！後來有一個自由黨的議員提議將議會分成兩邊投票，工黨議員竟無人贊成了。惟有一個工黨議員——威格伍——不知體統，提出修正案，結果還是受了一頓「教訓」了事。這個提案的初讀之後一兩日之中，這奇笨的事便顯然連一般民衆都認爲太糟糕了。所以工黨起初因爲怕得親德派的惡名，便不敢反對那人人認爲奇笨無比的提案的初讀，並且聲明不反對，到了三讀的時候却又有反對——十五張反對票！

(註一)失業，和平與賠款，尤其是第十一頁。

(註二)同上，第十一頁。又見勞工與和約第五至八頁，六十四至六十七頁。

(註三)勞工與和約第五至八頁，十二至二十頁，二十八至三十頁，六十四至六十七

這種可憐的丟醜的把戲的背景是什麼呢？

說來說去，還是這個道理：工黨雖然在全國大會裏通過了許多大膽的議決案，認為要防止或補救失業問題，必以恢復中歐原狀為第一步的條件，這時候却覺得自己受那公眾意見的拮据，因為當時的公眾意見是『反德奧的』，很強烈的反映着每日郵報的態度和英國人的根性，而不反映工黨那些議決案的精神。還有呢：這件事情之發生恰恰在幾處補額選舉之後，其中有一處選舉，工黨的一位前任領袖並且是勞工界出來的一位最大的議會雄辯家，被巴東賴的一個心腹人戰勝了，未得當選，而選舉得勝的工黨黨員却又多半是些贊成『強迫德國人給錢』的人：這又足以表示那普遍的新聞界的見解在勞工階級也是很有勢力的。湯姆斯君便是因為那種侵略主義，那『強迫德國給錢』『德國裝死』和『他們還是要佔你的便宜』這類的鼓吹論調，以致覺得只好屈服，一背工黨費盡苦心的政策的全部精神，聲明議會勞工黨不反對賠償案。



這不過是工黨在議會中的策略問題罷了，大報紙的影響已經有這麼大，那麼，到了工黨除批評他黨的政策之外，還要另提政策，有所「實行」的時候，那些報紙爲破壞工黨的計劃起見，還有什麼作不出來的事呢？新聞界之利用牠的勢力破壞工黨政策並不是必待工黨執政的時候纔會實現的事情；這是新聞界現在便在實地幹的事情。工黨執政的時候，那些國民心理的偏見，勢力觀念，社會的炫耀，社會上一般的虛榮心理，僥倖得到的頭銜，君主的寵顧，都足以破壞勞工的戰功，若說本書關於這一點說得太多，那是因爲這些事都是大家的弱點，資本主義的報紙所要勾引和利用的便是這些地方。正因爲這些事情對於勞工政治的關係不是直接的，並且決不常是看得見的，所以反對派要暗地裏打倒工黨，表面上不露妨害勞工運動的痕跡，也沒有什麼不行的。但是一個勞工政府如果自身便是抱侵略主義的，趨炎附勢的，重視頭銜的，只圖小利的，不關心重大事件的，或是依靠着這種的公衆意見而存在，那也就不是足以領導我們達到一種新的社會組織的政府了。但是現在這種新聞紙的原則便是只顧圖銷路

廣和賺錢多，絕不肯得罪人家，假如民衆的心理還是由這種報紙造成，由這種報紙支配，那麼，將來也還是不會變好的；這些道理，上文已經說得很透澈了。

## 第七章 工人如何纔能取得辦報的地位

本書的提議便是在工人易於得到的財力範圍以內用一種適當的計劃，可以將現在由私人經營的報紙和出版事業的大部分收歸工人手中。這種計劃實行起來，便是將合作的原則應用於新聞事業，大部分是利用職工聯合會的組織和職工聯合運動所促成的忠於階級的精神。

現在有組織的工人大約有七百萬了。這七百萬工人連他們的家屬算在一起，至少可以代表二千萬人民。這些有組織的工人假使相約都買職工聯合會或合作社管有或出資經營的報紙，只要實行起來，便可以代替大部分的資本，一個現代的日報有了這種

援助，也就可以自己供給，不靠資本家了。如果有五六百萬工人可以靠得住『先買勞工日報』，我想十幾種這類的報從開辦之日起都可以靠得住成功了。一個報紙開始便有五十萬銷數的把握，那就『不由得』大宗的廣告費不歸牠；並且這種銷數不是由於費了許多錢『爲推廣銷路而迎合社會心理』的結果，當然就不易動搖，這種銷數是由於閱戶本合作精神忠心於這類報紙，所以牠的經濟地位一定是自始便穩固的。這種景況當然要靠五六百萬人決定永遠購買勞工日報，即令暫時在脾味和嗜好方面稍稍犧牲一點，也不顧及；這樣集聚的資本當然是職工聯合會或合作社的能力所能辦到的。職工聯合會或合作社的會員將他們的錢投資於這種報紙，只要保持他們的誓約，絕對買勞工報紙，便可以永遠保障他們的組織不致因這種投資受什麼損失。不受損失的保障即是履行那種誓約；並不是用工人們積蓄起來的現款，不過是將他們現在用來買資本主義報紙的錢移過來買他們自己的團體所辦的報紙罷了。

簡單說來，這種計劃便是如此。其中更顯明的難題待後面再討論吧。主要的困難

當然就是這種計劃成功的根本條件：幾百萬工人每日都履行那件有紀律的事情纔行。若說這件事情毫無難處，那當然是掩飾的話。這件事情實在是一件難於組織的每日要履行的義務，不過當然並非不能辦到，而且是比較合作運動和職工聯合運動所已經成功的許多事實還要易於辦到的。

我們在判定這種計劃的可能性之前，必須對於現在的大公司報紙的經濟地位在我們心中存下一點概念。現在的重要出版專業組合便是：北岩組合，分爲四大公司（泰晤士出版公司，聯合新聞紙公司，合資出版公司，畫報公司）；達爾齊爾組合（合衆新聞紙公司和約翰狄克士出版有限公司；哈爾敦出版公司）；培里組合（星期泰晤士報有限公司，經濟泰晤士報有限公司，和卡士公司），奧得漢出版公司；和柯可亞出版公司（每日新聞有限公司和英國北部新聞紙公司）。泰晤士出版公司出了兩種報紙和幾種週刊和副刊；聯合出版公司出了四種，合資出版公司出了八十種以上的定期刊物或叢刊；至於畫報公司，雖則只出一種每日明鏡報，却對於星期畫報以及許多外省報紙具有

支配的勢力。合衆新聞紙有限公司出了八種報紙，約翰狄克士出版公司兩種。哈爾敦出版公司大約出了十七種不同的出版物；培里組合九種；奧得漢出版有限公司十種；每日新聞有限公司兩種；英國北部新聞紙公司七種。

這些公司除了出版這些報章之外，還經營着許多附屬的營業，最著名的便是造紙廠；如北岩出版公司便是一例。北岩組合直接或間接的管有紐芬蘭大瀑布那處的造紙廠，那是全世界第二大造紙廠。分送新聞材料的機關對於報紙之產生的關係，前面已經論及，現在談到這裏，不要忘了那種關係吧。

若把投資於這些報紙和附屬事業的額定資本數目說出來，那是足以使人發生誤解的。因為這類事業有許多都是以很小的資本作基礎，後來纔發達起來的。合資出版公司給他的通常股東的股息，多年都是百分之四十至五十之多。該公司現在的實額資本是一百三十萬金鎊。每日郵報現在的實額資本是一百一十萬金鎊。據每日郵報自己的某種出版物說，最初資本額僅十五萬金鎊（註）。北岩組合那兩個主要公司在一九一九

至一九二〇這一年裏除存下鉅款作公積金外，還付了差不多五十萬金鎊的股息，他們在經濟方面之發達，由此也就可見一斑了。北岩組合如果希望在謀利方面極力作去，單只牠這一個組合——包括牠一切附屬的財產——便可以付股息達一百萬元左右，並且不致有多大的困難；這話並不是過甚其詞。我們再想一想：這個組合固然是絕對的說起來還是很大的，但是牠還不過代表全國出版事業的一部分（因為我們要留意定期刊之出版，單從金錢上的利益而論，比日報還要重要），我們只要想到這點，也就可以想見新聞事業在經濟上的重要了。

（註）見關於每日郵報之秘聞（聯合新聞紙有限公司）

還有一層，出版工業的全部近來也遭過一種嚴重的危機，其原因雖由於出產一般的漲價，主要原因還是在於紙價之貴，這一點我們也不可忘記了。我們常看見那些舊日開辦的新聞紙或出版業倒閉的消息，因此我們也就看見一種日甚一日的趨向：大家都漸漸組合起來，合併起來了。近來這種關鍵的結果大致將使弱者無以自存，使強

者的地位比較着更強。在比較發達的公司方面，顯然有意增高出產的價格，爲的是要免除以後的競爭。這話並不是故意造謠的。就事實而論，所有的報紙都不得不大增他們的價錢。各省的日報，戰前賣半辨士的，現在賣到一個半辨士了。並且這樣增了價還不要緊，原來付利息很豐厚的現在大多數都獲利極微，甚至還要虧本。

這個關鍵的惟一效果大致就是使大衆慣於比戰前數十年中多費買報紙的錢罷了。這便是所有的好處。假如大衆重視他們的報紙，他們所付的報價便應該值得他們心痛纔行。所以報價增高便可以使報紙不僅爲廣告的附屬品。現在一辨士或一辨士半的報紙大致是成了通例了。而白紙的價錢又似乎不會長久像現在這樣昂貴，所以將來報紙的收入必是賣報的錢多，而廣告費比較的少。這種變更對於下面所討論的計劃是非常有利的。從此登廣告者的勢力將漸成較小的勢力，而閱戶的勢力則較大。換句話說，組織閱戶的辦法因此可以較易實行，因爲將來由閱戶方面直接的收入比較的將比從前增多了。

某種報紙成爲一種有錢有勢力的事業，而他種報紙却不能自存，其中究竟有什麼原因呢？我們不可不明白新聞紙產業的價值是由什麼而成的，牠與別的商品不同之點又在什麼地方。我們拿兩家日報來說吧：每天早晨他們在競爭方面是『同樣開始』的，兩報都是以同一價錢出版，兩報都可以得同樣的原料——白紙，新聞材料，公衆事件等等。其一沒有收入，另外那一個却有絕大的收入。這有賺錢能力的報是得力於那一點呢？這種能力完全是由於那個報紙會極力使閱戶方面對牠發生偏好的心理，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種習慣了。一個報紙的主要開銷多半是專用來造成那種偏好心理，其所以用的方法使用推銷，廣告，罵人等等。要想在閱者的心中造成一種習慣，這筆用費是不可免的；因爲那種習慣或偏好心理便是報紙得到錢財的根本來源。

工人們在他們自己日常行爲的能力範圍以內便具有這種錢財的來源，這是很明顯的。報紙的錢財和勢力之與土地，商業，工業資本的財力不同，主要的便正在這一點。譬如大家要想取得土地或工廠的完全管有權，便不能不打倒許多困難的法律的和



歷史的障礙，要打倒這些障礙，便不能不藉憲法的手段，不能不將全國歷史和傳統之中那些根深蒂固的法則加以改換，不能不將經濟制度澈底改良；否則只好嘗試那成敗難定的恐怖的強迫革命手段，至於要將他們自己的報紙的所有權取到手，那是無須改變古來的法則，無須制勝什麼憲法上的困難的。至於資本也是大部分不要從工人們的資財方面出的，只要他們肯忠於他們的階級，肯守職業聯合會的紀律，勞工報紙便可以出版之前先有相當銷路的把握，那就行了。中產階級的報紙大部分的資本都是專用來「推廣銷路」的。銷數是廣告費收入的基礎，所以對於一個報紙的關係很大，其所以值得爲牠花費這麼多錢，也就是因爲這點（註）。但是資本主義的報紙爲了銷路須費這麼多錢，勞工報紙却是毫無所費便能得到，不過在工人方面要每日習慣作一件小小的事情罷了。只要他們肯這麼辦，這些絕大的財源和政治的，社會的，以及道德的勢力便都可以歸入他們自己掌握之中了。

（註）譬如合資出版公司有一個報在歐戰前一兩年的戰單裏，一年之中，土地，房

屋和工場的錢數爲十二萬零六百鎊，版權費和推銷費爲七十八萬鎊；公積金爲二十五萬鎊，贏利爲二十七萬八千鎊。這種推銷費若在勞工報紙便可不用，只要管理和維持牠的職工聯合會忠心就行了。

這裏不是『與集中了的資本勢力血戰』的問題。軍火是用不着的。並沒有什麼『雇來的刺客』須要我們抵抗；沒有什麼軍隊須要我們戰勝；沒有什麼軍力封鎖我們，須要我們衝破；我們也不要建築什麼堡壘；也不要宣布什麼無產階級獨裁制——不過這種改變的結果實際上也是工人們道德的獨裁制罷了。這便是工人的機會，無須流血或吃苦，即可以取得資本主義和舊社會的最強的堡壘，最大的勢力之根源；換言之，即可以取得資產階級支配人心和支配全國的行動和政策的工具。工人們要獲這種絕大的勝利，所必要的並不是死於巷戰之中；只要在他們清早上工的時候買勞工報紙而不買資產階級的報紙就行了。他們每日作這件小事情便可以使資本主義受他們的主宰。只要工人們下了決心不看資本家的報紙，資產階級並不能施什麼『武力』改變他們的意

志。軍事的壓制也是不會有效力的。數十年來，常有人要求工人們起來擺脫他們的鎖鏈；告訴他們說，他們必須準備着爲革命而死。不消說，無數的工人是情願犧牲性命的，但是他們是否情願拋棄他們所愛看的大公司報紙的游藝欄，改看他們的職工聯合會或合作社所出的報紙呢？勞工報紙起初是不會有資本家的報紙那麼編得有趣味的，工人們會不會情願犧牲一點興味呢？

工人們解放他們自己的能力究竟如何，這件事便可以作個考驗。有一派人常對我們說，「資本家非經血戰是決不會給還贓物的」。但是現在這個問題也和許多別的問題一樣，並不是要使他「給還贓物」，不過是阻止一方面的錢財歸他罷了。這種錢若不是因爲工人們甘心給資本家，根本就不一定要向這方面流去，這或者正是因爲工人們不會設想，總之，甘心情願和不會設想的結果是一樣的。若要將一種完全新的制度代替那苦心造成的資本主義制度，或是要使土地復歸民衆，那是不容易辦到的事，工人們當然非遇着非常大的困難不可——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各方面都有困難。至於

這個收回報紙的事情呢，主要的成功條件只是一種簡單的習慣，最沒有運氣的工作也能作得到的。只要有這種習慣，不僅可以使民衆得到『利益』並且還可以得到勢力，比議會裡的勢力還大；如果要想實現什麼澈底的改革，便非首先取得這種勢力不可。工人方面對於這件小事情若有了這種日常的習慣，其餘便完全好辦了。

現在所討論的這些提議，其中事實是這樣的：只要銷數有了把握——無論是編輯方面設法迎合社會心理，或是用別的方法得來的把握——辦報所需的資本便不必很大。有時候大宗的款項爲了辦報損失了。這種錢一多半是報紙還沒有得到相當銷數的時候勉強支持所費去的。換句話說，最大的費用便是求得銷路的費用。（註一）據每日郵報記載牠自己的經過（註二），牠最初的資本是一萬五千鎊。這個公司現在成了聯合新聞紙有限公司，在未出每日郵報以前，開始是出的倫敦晚報，統共只費二萬五千鎊便買過來了，第一個星期裏便付清了買價。肯納得·江士君與這個公司的關係是很密切的，據他所說，他們決定辦一個半辦士一份的早報，經費便是出自開始兩年所獲的

利錢。(註三)那兩年的贏利是四萬鎊。

(註一)一九〇八年四月講壇報最後一天出的報上談到牠失敗的原因，(差不多損失了二十萬鎊)，說道：『在現在這個時代，無論那個報要想立定根基，成爲一種商業的成功，至少非待三年以上不可。這是發達遲緩和成功不易的問題……講壇報在開辦的時候便逢着了困難，因爲歸牠支配的資本太不够應付了。』前面有一個附註裏已經說過，某公司的推銷費差不多達八十萬鎊之多，公積金爲二十五萬鎊，而土地，房屋，和工廠的價值僅十二萬鎊。

(註二)每日郵報之祕聞(聯合新聞紙有限公司)

(註三)佛里街與唐寧街，第一百三十六頁。

我們若想一想，像自由黨的講壇報這麼一個報紙，據說便費了三十萬鎊以上，當時的物價差不多只及現在的物價之半，並且那三十萬鎊還不夠用，這樣看來，我們也許不免對於辦報的資本問題發生錯誤的見解；這裏之所以提及上面那幾件事情也就是

爲這一點。要知道普通新聞事業之所以費去那麼多資本，是因爲在尋求銷路的時期以內必須苦心經營，度過難關，（在這種時期以內，一個日報的損失常是一星期達兩三千鎊之多），其次又須再過一個難關，在這第二個時期裏便要設法使登廣告者知道這個報紙的銷數已經穩定了。

我們可以大膽的說，即令現在的新式報館完全設備起來，只要費十萬鎊也就够了；至於營業的資本呢，若能依前面所說的辦法自始便使銷數有了把握，那就只須五萬鎊就行了。那麼，我們再想一想，單說全國鐵路工人聯合會這麼一個職工聯合會便有了一百一十萬零五千鎊的存款（一九二一年二月）；（我們只要假定會員對於維持他們的報紙這件事能够一致忠心），這筆大款只須拿出十分之一便可以將報紙辦成功，辦成之後，依種種前例推測，每年很可以得到這種投資之半數；我們明白了這層，便可以知道這是工人的好機會——只要職工聯合會忠心，便可以藉此化爲絕大的財源，還有絕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勢力隨着這種報紙的管有權而來，那也不是消說

的。

這種計劃的經濟和行政上的詳細預定，現在不打算討論，因為那是完全出了本書的目的範圍以外的事。本書所說的幾種數目無非是爲的使讀者能够明白這種計劃之可以實行罷了。不過還有幾點可以補充一下。

各職工聯合會的合作並不是僅限於供給開始的必需資本。在牠們現在的組織之下，要牠們將日報分給工人是作不到的；卽令是分配書籍和定期刊物也不能不先和零星賣書的商人解決許多麻煩的問題，何況日報呢？不過職工聯合會對於這件事情大概也不能不盡幾分力量。關於這點，以下還要作較詳細的討論。現在再討論討論合作社的關係吧。

各合作社是需要登廣告的地方的，這並不是僅爲登牠們的貨品的廣告，此外還要登牠們的原則教育羣衆。私資營業愈形擴張，合作運動不前進便須後退，這話當然是不錯的。如果合作運動要圖發展，要靠更大的成功證實牠的原則，牠遲早必將明瞭那

不好的現象，知道現在全國的新聞紙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依那圖利制度而存在，而這種制度却正是合作運動所要打倒的。新聞紙與私資營業的登廣告者既有了現在這種關係，一定不免常有惡意的宣傳，反對合作運動，所以合作運動如要圖發展，便非設法應付這種環境不可。

職工聯合會和合作社在現在都費了很多的錢作教育用途——這種教育的效果常是在一二年中便被資本主義報紙的宣傳完全抵消，這些報紙每天都要有所暗示，故意激起大家那種無意識的心理和感情作用，破壞這兩種組織的教育工作。除了教育宣傳的必需而外，還有登廣告的普通問題。（登廣告並不全是白費錢，這層意思前面已經說過，現在不妨再提一提。要想貨物的暢銷，有幾種廣告是不可避免的。爲調節消費與出產起見，有時候便必須加重的說明，某種某種出品很充足而且價廉，可以出他種稀少而價昂的東西，比較能有益。這樣一來，出產者和消費者便都因得到這種消息各有好處了。）關於合作運動的登廣告的必要，有一種結合的基礎，那是資本主義報紙與私



資營業所不能仿效的。有些大公司的主人，如合羅得和塞佛里支這兩個公司的主人，在紙價每鎊六辨士的時候以前，常討論他們自辦一個日報是否合算。因為辦這麼一個報即令沒有贏利，只要能登廣告也就合算了——有時候還有一種特別的便利，可以在新聞欄裏登廣告——那些大公司每年在廣告費這一方面要用去十萬至五十萬鎊，自己辦報便可以省去這筆大損失，當然是值得辦了。

職工聯合會是與對敵的資本主義圖利事業對抗的，合作社是保護並發展牠們的原則的，所以在這二者之間當然有共同的利害關係，要圖保護這種共同的利益也就可以用合作的方法聯合起來了。一個日報若能藉職工聯合會的擁護得到銷數的把握，又能從工業合作社方面得到最低限度的廣告，那就可以將那兩種經濟問題大體解決了。職工聯合會和合作社對於這個問題所可深信的便是：如果職工聯合會投資於這種專業的好處錢發生損失的危險，那一定是由於工人隊伍裏的惰性；合作社在廣告方面所得的好處不但不是通常商業廣告的利益，而且還能保持必要的政治宣傳，所以縱或在投資方面的

利益有所損失，也可以拿這種利益抵銷了。

本書所討論的不過是這些事業的大概，這些事業決不是僅限於日報的；書籍和定期刊物當然是自然發展後所要出版的——或者是以出書和定期刊物開始。實在說起來，各方面的勞工運動因迫於環境，常是不得不出定期刊物和書籍。譬如各職工聯合會便出了十幾種週刊和半月刊，還有五十種以上的月刊。這些刊物大半都是報告各職工聯合會的活動情形，但是有許多種所載的材料比較範圍稍廣，還有幾種也登載一般人都愛看的文章的。工黨也出了些定期刊，如公報，常年報告，勞消工息，和勞動婦女；此外還出了些小冊子論文和小書，都是討論大家所注意的現代問題的；還有許多單頁印刷品，隨便發給大家看的。一直到最近，勞工調查部與工黨合力進行，經營出版事業，一半算是獨立的，一半算是與工黨有連帶的關係。自一九二〇年年終以後，勞工調查部的出版事宜大部分歸了勞工出版公司接辦，這個公司之成立是自始便以此為目的的。這個新成立的公司正在很快的擴張牠的範圍，現在出的廉價書籍，小冊

子，和定期刊頗爲不少，都是補助勞工運動的。此外他還極力推廣銷路，不僅限於勞工運動的隊伍裏，並且還藉通常的商業機關，將牠的刊物分銷於一般民衆。

獨立勞工黨由全國勞工出版公司出版了勞工嚮導和社會主義評論，還有布拉佛，里賽士特，墨得爾和伍爾維支等地的先鋒報，以及爲該黨出的許多書和小冊子，都是有價值的；此外還經營一個很大的印刷公司。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中里賽士特全國勞工出版公司黑袍僧出版公司各部的營業額達十萬鎊以上，（黑袍僧出版公司經理獨立勞工黨在英國中部的印刷事宜）。現在有一項計劃正在考慮之中，預備將全國勞工出版公司的出版部和國際書局有限公司合併，這種辦法如果實行起來，便要使獨立勞工黨在出版方面活動的範圍益加擴大了。（註一）合作運動也有牠自己的印刷公司，出版了合作運動消息，麥草束和合作之導師。勞工運動在上述各公司方面嘗有很完備的印刷工廠，此外在各省也有許多較小的印刷公司，還有鋼鐵等業職工同盟會嘗有高薩唐尼安出版公司，工廠很大，設備也是很完全的。（註二）。

(註一)本書作成後，這種合併計劃業已實現了。不過結果頗不如吾人的希望，並不會使獨立勞工黨在出版方面活動的範圍擴大，但是主要的原是由於合併以後商業環境之不好。

(註二)高爾唐尼安出版公司的總理人是佛蘭西·莫斯，創辦者是英國鋼鐵等業職工同盟會，地址在倫敦西城格雷館路司溫頓街七十四號，資本四萬六千鎊，該公司不僅能印同盟會所要印的東西，還能替一般勞工運動的其他聯合會和朋友們印東西。營業情形可作模範；工廠內有新式排字機和完備的最時新的活字，以及最新發明的印刷機和訂書機等等。該公司於一九二〇年開辦，到那一年年終的時候，雖然實際印刷的期間只有兩個半月，却差不多有二萬鎊的營業額；一九二一年中，商業情形雖很壞，該公司的營業却有進步，現在出版的有十八種週刊，半月刊，月刊和季刊，此外還出了許多很好的書並經營普通營業。

由此看來，勞工運動全部的出版物已經是差不多有合資出版公司或紐恩公司那樣

的組合所出的出版物那麼多了。（紐恩公司雖然也是全國最大公司之一，却連一個日報都沒有，足證雖沒有日報，只要採日報的辦法幫助着都是很有利益的。）不過從事這種工作的營業機關有一種不利之點，因為資本主義的營業都沒有充分的廣告和分銷，並且大規模出版公司還利用很多其他的合作方法，這都是勞工出版事業所缺乏的。那些大規模出版公司不僅有交換廣告的利益，有時還可以定出合作的辦法，從紐芬蘭方面供給紙張，譬如以北岩組合而論，便是如此。（前面已經說過，這些大報館都是直接或間接的管有紐芬蘭大瀑布方面的大造紙廠的。通訊機關常是牠們公共的，比較費錢多的海電便由牠們分擔；還有諸如此類的便利。有了這些辦法，其利益是不消說的。

但是勞工運動却有一種尚未十分明顯的長處，將來也許可以實現範圍更廣的合作功用。譬如拿一件關係最大的事情——分銷——來說吧。關於這件事情，合作社和職工聯合會都可以互相援助。凡是合作社有分送麵包，牛乳，以及其他日用品的機關的地方，這種機關的任務便可以擴充起來，將分送日報的事情也包括在內。職工聯合會

支會可以作售賣勞工出版物的代理機關——這件事現在已經算是稍微辦到了。

前面已經說過，普通報紙的標準價錢之增加（從半辦士增至一辦士以上）不僅使賣報方面——換言之，就是閱戶方面——所得的收入比較廣告方面所得的收入多，並且還能使利用職工聯合會作分銷報紙的機關這件事易於實現，使職工聯合會支會易於成爲分配定期刊物的機關，尤其是因爲書價也增高了，（七辦士的小說能賣兩先令，）這種計劃便更容易實現了。

職工聯合會和合作社都不是通常的報紙代銷處和書販，所以書報由他們經理當然不免引起一種重大的問題，並且就事實而論，業已發生問題了。若有一個出版公司或報館利用職工聯合會支會或其他組織作分銷的機關，同業便要聯盟抵制。民衆如果始終要求，也許可以隨時阻止這種抵制行動，但是民衆是沒有組織的，我們也就不能希望他們始終有這種要求。並且勞工的團體要想強求各地小商人隨工人的付託供給他們所需要的書報，那也是不容易的事，而且有許多地方是不可能的事。即令是勞工的團體

裏面也還是有些男女工人并不一定要看某書某報，只要別的方面供給他們別的書報，他們也就不會拒絕的。不過勞工運動委託職工聯合會支會分銷書報的大計劃，若是讓少數小商人的營業妨碍其實現，那是不對的。從另一方面說，勞工運動如果將分銷的事完全移給勞工團體經理，也是要發生不好的結果的，因為那麼一來，零賣書報的小商人便將根本不販勞工運動的出版物，於是勞工運動的範圍以外的人便完全不能得到這類書報了，甚至勞工運動以內的人有時也不免因其所在地的勞工團體關於這方面的事不甚活動，便得不到這類的書報。

因為這種原因，所以必須採取的辦法便是給各支會以相當的折扣，使其足以報酬牠們的工作，但是不能像普通販賣商人所享的折扣那麼大。為免除衝突起見，其間的差別應達相當的程度，務必使商販能夠將他們所賣的出版物供給那些勞工支部團體，其條件也能和那些團體向出版公司或報館直接訂購的條件一樣。這種辦法可以使那些勞工團體就地得到這類出版物，並且可以免去牠們大部分的分銷費用和虧本的危險，

不清說是很公平的辦法了。同時對於販商方面也是很公平的，因為關於這一類出版物的營業，他便成了批發商了（註）。

（註）我們拿一種具體的情形來說吧：現在多數出版公司賣書給批發商號的折扣是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每月或每季結賬時還有百分之五的回扣。零售的商號購買每種十二份以上時所享的折扣是百分之三十三又三分之一，所購數目不到十二份時，折扣自每先令折二辨士以至百分之二十五不等。既是這樣，出版公司如果願意使勞工支部團體的書記享百分之十七以下的特別折扣——譬如勞工出版公司便是用這種辦法——不消說，書商當然也可以給他們同樣的折扣，尤其是營業發達的時候容易辦到。書商起初也許不高興這種辦法，因為他並沒有銷售數目增加的把握，他只覺得有人利用他。如果他始終不明瞭，定要持這種態度，那麼，有組織的勞工運動便可以根本不和他發生關係。不過我們還是希望書商能明瞭實際的利益，知道承辦這種出版物可以擴大他的營業範圍。關於定期刊物的批發辦法，折扣數目雖有不



同，大致還是相似的。職工聯合會各支會以現在這種情形，要分銷日報是不行的。這種支會如要分銷日報，便須成爲一種通常的分銷處，種種的閉銷是不免的。並且還要有完全的賬目纔行。這種辦法實行起來，書販現在的營業必將因此稍減，將來營業更要受很大的影響。但是有一點是很明白的：書販如果是能力充足的，並且明白勞工出版事業將要發達，他便可以應付各勞工支會的需要；若不然，他便是應該由勞工團體取而代之以了。總而言之，書販的營業究竟是資本主義的營業，勞工運動是決不能容牠妨碍進行的。

由職工聯合會和合作社經理新聞紙和定期刊物，當然有許多地方要發生困難。不過勞工運動已經表示足以勝過種種絕大的難關，比這件事將要遇到的困難還要大得多，我們看看合作社的歷史便可以知道了。新聞紙之所以要辦得完善，固然也可以說是專爲推廣銷路，但是新聞事業在出品和分銷方面的困難究竟是附屬於獲得銷路的大問題的。大資本的報紙有時候花費許多的錢，在鐵路上出了事之後收集關於肇事的影

片，有時候特印本地新聞，租用專車，和牠競爭的報紙若是無力作這些事情當然就要漸漸的被淘汰了——這種報紙若要維持下去，除有許多人經了訓練之後，特別喜歡看牠纔行，譬如勞工報紙所處的境地便是如此。這種報紙對於分銷敏捷這一點當然也不可忽視，猶之牠對於編輯和搜集材料之不可不講求一樣。不過只要職工聯合會忠心於這種事業，便可以使牠漸漸講求這幾方面之完善，應付別的報紙的競爭，並且除奪去資本主義報紙的財源外，還可以使勞工報紙有錢用來講究一切。

在現在這種情形之下，各報只願擴張銷路，公然的競爭，結果便造成了一種很壞的現象。牠們花費了許多錢包租專車和打海電等的事，於是銷路便推廣了；有了大銷路便有人來登廣告，於是便更有錢了；有了這些財源，便可以多花錢講求設備，設備愈完善銷數也就愈增加，於是登廣告的也就更多了，如此互相因果，循環不已。但是這種辦法，只靠用錢來推廣銷路，一切道德上的破產都不管，若是勞工運動有了牠自己的報紙，並且一致的擁護牠，那就不怕不能與那些專靠錢力的報紙相對抗了。

讀者大致要發生種種懷疑，譬如公民日報的經驗和每日前驅報努力的經營以及蓬如此類的事實便是足以引起這些懷疑的。我們既說是多種的勞工日報可以同時得到成功，為什麼前驅報有了比較前面所說的數目更大的資本，還是沒有辦法，以致於不得不將報價加作兩辨士呢？牠為什麼還要更大的資本呢？

其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前驅報並不是完全適用上面所說的方法經營的，這是由於牠有牠的來歷之不同（該報的來歷是很好的）。牠會請職工聯合會各執行部幫牠的忙，這些團體便又請牠們隊伍裡的人援助，但是沒有十分盡力；上面所討論的那種原則也就未能完全實行了。

凡是對於世事經驗豐富一點的人都知道要想試驗某種方法是否能行，只試一半而失敗是最靠不住的。有些方法本是可以促成工業革命的，初試似乎是失敗了，其原因或是由於試驗不得其法，或是由於缺少某種成功的必要條件，或有之而沒有見到；這種事情，歷史上不知有多少次了。在汽機應用於船舶之後，幾十年之中，一般水手

還是笑這是夢想，他們認為汽力是決不能勝過帆力的。在汽車成爲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之前七八十年便有了自動的車輛在倫敦和布列斯頓之間行駛了。汽力初發明的時候誰也不注意，一直過了一百多年，牠纔在工業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就已往的事實看起來，前驅日報或週刊成立之前，職工聯合會從來沒有對各支會作有系統的請求，請牠們援助這種勞工報紙。這裡所討論的計劃要想成功，却非全靠職工聯合會切實要求各支會一致援助不可。

這個問題或者最好是這麼說：職工聯合會和合作社在打算自己出一個日報以前，非共同預備花費五萬鎊以上作事先的教育費不可，其期間至少要六個月，否則根本就不能算是這種計劃業經試行了。

第一步便是要使職工聯合會裡面的領袖和少數活動的人物明瞭勞工報紙有這種要求，使他們肯在這方面努力。我們若從公民日報和前驅日報的歷史看來，這一步更沒

英國工報只靠了兩年半的壽命，到了一九一五年六月終不得不壽終正寢。種種的困難本是很明顯的了，再加上大戰爆發，物價又增高，便更使牠不能應付了。後來到了無法維持的時候，曾經開了兩次會議，打算請求職工聯合會援助，第一，請牠向會員強迫徵收捐款，其次徵收自由捐款，務使足以維持公民報繼續出版。這兩次會議都失敗了。該報終於不得不停止出版，起初是倫敦方面停刊，後來滿傑士特方面也停刊了。當時公民報是代表勞工利益的惟一報紙，牠的勢力是勞工運動所切要的，但是勞工運動竟因不能或不願的關係未曾將該報維持下去，這是我們認為近年以來勞工史上最可歎息的一樁事情。

前驅日報是由前驅週刊擴張而成的。牠並不是由職工聯合會創辦，也不是因為職工聯合運動而產生的。最正確的說法便是將牠認為牠的創辦人喬治·蘭茲培里對於勞工運動全體所發生的影響的表現，至少在該報開始的時候是如此的，後來牠發展起來了，有許多能幹的有作爲的青年聯合在喬治·蘭茲培里的旗幟之下，所以該報的後半

期便代換這些青年人的誠心的理想。該報所處的地位雖然不免太偏左了，不能十分代表英國勞工運動現在這個時期的發展，但是牠對於這種運動的貢獻却很大，比較職工聯合會對於這種運動的援助真是要大過一千倍。(註)

(註) 喬治·蘭茲培里無論如何不會將本書提議的辦法認為有損於前驅日報先獲的成功。因為再有勞工報紙出現，不但不致使前驅報的成功發生危險，並且還能增加牠的成功之把握，這一定是他所能見得到的。五六種勞工日報和幾十種週刊和定期刊物一致合作，其前途之成功一定比較一種勞工日報單獨進行更為可靠。我們試看資本主義報紙的歷史便可以明白這句話所含的道理了。譬如哈爾頓或哈姆士倭在創辦一種報紙之後，再着手來辦第二種，這第二種的報並不妨礙第一種；二者是互相為助的。至於這些大公司之彼此互相競爭，似乎也於牠們的成功穩固大有益處，這是前面已經說明過的。我們現在很可以說這種原則應用於合作運動，勞工運動，職工聯合運動要緊組織的結合，結果一定也是不會亞於那些資本主義報紙之合作的。

前面已經說過，前驅日報之產生是由於一種週刊擴充起來的，那種週刊只可以算是一種出於自願而起的宣傳刊物，因為這種來歷，所以前驅日報不能完全的利用本書所提議的辦法。牠自始便在設備等等方面感受很多的不利；關於購辦紙張這件事情，牠便遭過一種類似聯盟排斥的抵制；登廣告者方面都偏好照顧資本主義的報紙，這也使前驅日報感受很大的困難；加以該報開始的資本也不够用。牠初成一個日報的時候，只有十萬鎊的資本，當時正是戰後，報紙出品的代價一天一天的增加，紙張也漲成了聞所未聞的價格。該報又不能向職工聯合會方面用長期教育運動的方法作事前的準備，所以牠出版的時候，勞工團體還是不能自動的援助牠。於是該報爲推廣銷路起見，便不得不採取資本主義報紙所慣用的方法，這些方法，資本主義的報紙當然比牠易於利用得多了。牆上張貼大張的廣告，競賣的手段，爲推廣銷路而迎合社會心理的言論——這些方法，前驅報都不得不應用起來。牠之求助於職工聯合會，可說是從外面來。牠直到經濟困難和感覺其他難題的時候纔來請牠們幫忙。牠却不是從職工聯合

會裏面產生出來的。

假使一個規模較大的勞工報紙要想到成功，便非在勞工教育方面作大規模的鼓吹不可。但是公民報和前驅報都爲了某種原因，不能從事這種充分的鼓吹，並且前面所說那種計畫的主要條件便是要得勞工階級的全體擁護，而這兩個報紙却都不曾向職工聯合運動的隊伍裡取得這種援助，其勢力當然就非常單薄了。

在勞工報紙尚未產生之前，必須首先對於幾種必要的條件有實現的把握，這是前面已經說過的。要作到這一步，第一遇到的困難便是如何纔能說動各職工聯合會，使牠們明白在報紙還沒有出版之前花費五六萬鎊錢作勞工教育和得工人擁護的用途，並不是空前的浪費。但是這雖是一件難事，却非首先作到不可。

現在若拿外國方面的經驗來作例，當然不能使大家十分明瞭。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日報有幾種是非常成功的，這固然是事實，但是那些報是由那一黨辦的，而不是由職工聯合會辦的。前進報在戰前常能每年約一萬五千鎊之多給該黨作經費。當時該報的



銷數是十七萬份，而社會民主黨所經營的報章總共有九十三種之多，銷數共計一百八十萬份。大戰使前進報所受的損失非常之大，但是利益雖然大大的降落了，却究竟還是有的。據社會民主黨一九二〇年的報告，該黨黨報總數為一百四十七種，其中有九十一種在那一年中的總銷數為一百一十八萬六千份。一九二〇年所得的利為一千三百萬馬克，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所得為三萬七千馬克，但因幣價跌落的關係，拿這些利益的數目來作比較是毫無用處的。一九一八年八月，該黨各黨報代表議決將牠們所得的利百分之二十五撥作黨費。另一方面呢，該黨從這些出錢的報得到一部分的利錢，牠對於幾種特別不出錢的報便不給什麼便宜牠們佔，並且為開辦地方報紙而募款的時候，牠也不肯作擔保。(註)。

(註)德國的職工聯合會報紙是入不敷出的，戰前也是如此。主要的職工聯合會報便是新聞探訪報，牠是職工聯合會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機關報。牠的費用是從通常經費裏面拿出來的，牠的銷數約計三萬份。除此以外，該中央執行委員會還出了一

種婦女職工聯合會報，這個報比較的算是沒有負債；從前還出了一種意大利職工聯合會報和一種波蘭職工聯合會報，都是沒有負債的。除了這幾種中央機關報之外，五十二個職工聯合會各自出了一種報，費用由會中經費拿出來，通常是將這些報白送給各會員看。這些報在戰前有二十四種是週刊，總銷數為二百六十二萬二千三百份。現在的確數無從知道。

英國的職工聯合運動是世界上各國規模最大的。它在議會制方面是全世界的先進，在職工聯合運動這一方面也是先進。英國的合作社運動雖然比較的弱於幾個國家，却也表現非常的有生氣。從前屬於職工聯合運動範圍以內的任務多由立法方面漸漸的負責了。那麼，職工聯合會要將牠們的任務向這裏所提議的方面發展，是否可以辦到呢？我們要將這種勢力與教育（錢財且不說）的無限來原移於工人之手，必須經一番訓練，這種訓練工夫是否可以組織成功呢？這種訓練工夫雖然只須工人每天作一件日常的小事，但是在某一方面而論，這實在是極難作到的，不過究竟還沒有什麼絕對不

能罷了。這種訓練當然比我們要一個人時常以他的性命作犧牲的那種訓練還要難於實現得多。這必須經一番認真不斷的很周到的教育工夫纔行。但是這也不是絕對不能作到的事。只要有兩三個受人信仰的職工聯合領袖人物熱心作去，這件事情就可以活躍起來了。

他們從事這種運動，不免有幾種顯然的危險。第一便是我們現在對於平民的管理或平民的方法所持的見解的性質問題。譬如說一個報紙的經理除應負完全責任而外，還應予以主持該報的絕對權力，通常的職工聯合會必認為最違反平民精神的辦法。但是要想使本書所主張的合作報紙能與資本主義的對手相競爭，恐怕非這樣辦不可。因為勞工階級相約購閱勞工日報的擔保只能視為勞工報紙藉着開辦的方法，開辦之後便要靠着這種援助與其他報紙競爭，結果終究還是要有相當的成績，也要和牠的對手一樣的辦得合人家的脾味纔行。若是勞工報紙的消息始終不如資本主義的報紙那麼靈通，或是興趣不及那麼好，那就不能希望勞工階級的援助繼續下去，雖然也許是漸漸

的渙散，却是非淺鮮不可的。

要想報紙辦得好，惟有權力使那負責任的編輯或經理方面得到充分的獨立，此外再使消息正確決斷迅速便行了；一般而論，這幾點都非有充分的單獨主持的權力不能辦到。大家愛看的有趣的報紙與那沉悶的不受歡迎的報紙之不同，其原因常是很不可捉摸的。前面已經說過，各個報紙每天早晨出版時所具有的條件差不多都是一樣的。每日快報和每日郵報每天早晨所有的新聞材料和印報的白紙都是一樣。爲什麼若干年來，每日郵報之使大衆興奮和感覺興趣，遠勝於每日快報呢？正因爲其中的差別是不可捉摸的，所以要想說服一個職工聯合會職員的委員會或合作社的經理們，使他們花費很大的代價來請教高明的人，那是非常難於辦到的。有些事情在有經驗的新聞家看起來是十分重要的，而在這種外行的委員會看起來，也許就認爲毫不相干了。

(註)我們很可以說，除非職工聯合會和合作社對於牠們將來的編輯員像政府對於牠的法官一樣的看法，除非他們能夠得到同樣的獨立地位，那就不僅將來的勞工報紙不能

勝過現在一般的報紙，對於各種問題持大公無偏的態度，即在編輯的技術方面也是一定不會好的。

(註)我們若是以爲一般看報的人知道使他們發生興趣的究竟在那一點，那真是大錯特錯的見解。他們必待人家給他們說明白了，然後纔懂得。你若是問一問普通看報的人(不消說，他是無主見的)，關於明天將在國會舉行的辯論，或是巴黎舉行的會議，或是將要表演的歌劇，他喜歡知道什麼，或是問他關於罷工的事使他注意的是那一點，他對於新劇所高興知道的又是什麼——你若問他這些事，他一定會對每個問題說許多話。但是你若在這種試探之後，便本着這個結果作發表每日的新聞的方針，你所出的報紙恐怕他是決不會高興看的。新聞記者由經驗知道其中的秘訣，知道普通看報的人所注意的事情，事實上常是他聲明或自以爲他完全不關心的事情。

但是這種計劃如果成功，便能够解決本書前幾章裡所討論的那些更根本的難題

嗎？這種報紙在道德方面而論，果能勝過現在的報紙嗎？

或者是不會好得很多的。不過只要二者不同，那就是好結果，在最近將來的這個時期裏，社會上必要起一種爭辯，將來由民衆作陪審團，大家對於這種辯論便有聽到雙分意見的充分機會了。只要這種雙方相持的辯論能夠實現，社會上便能由此收到一種教育功效，民衆的判斷力也就要進步了。

但是我們還可以存一點更大的希望。像職工聯合會或合作社這麼一個社會的大組織對於報紙宣布事實所應守的原則如加以靜心的考慮，想必能使我們有一個較好的標準，不致像現在這種不顧一切只管推廣銷路的辦法。一個大團體的行動有牠的領袖人物主持，大致不會認爲牠的報紙只顧說無價值的話和假話便於牠最有利益。卽令是那看大英國報或警察公報的人到了參與討論的時候，究竟是否說這類報紙便是他們的團體所應該出的報紙，那還是不能令人無疑問的。

現在在本書完結的時候，我們把前面所提出的辦法再總括一下吧。

一個社會化的國家應該：——

(1) 除允許甚至鼓勵出版自由，使私人可以自由出版報章，書籍，定期刊物，傳單等項外，同時將關於匿名和誹謗等事的法律加以修改，以免現在那些私有報紙所不免的弊病。

(2) 使新聞事業成爲一種法定的職業，與法律和醫藥一樣，必須有相當的資格並遵守明定的職業行爲的法規。

(3) 辦一個國家的或政府的報紙，但不由政府主持，而由一個『新聞裁判團體』主持，這個裁判團便負公平無私的宣布新聞的職責，其對於行政部分應立於獨立的地位。

(4) 鼓勵有組織的勞工創辦他們自己的合作報紙，使他們利用職工聯合會和工業的合作社的組織以達這種目的。

最後還有一句話。我個人並不是覺得這種計劃在最近的將來便能大規模的實現，

也不是認爲現在試行起來便能有多大的成功。不過這並非說這種計劃不能實行；不過是說沒有人肯來實行罷了。簡明一點說，就是勞工運動還沒有充分的具有實行這種計劃的意志。這一步辦法與勞工階級所希望的其他的事情之間，彼此關係之重大，大家還沒有十分看清楚。職工聯合會和合作社之宜於有一個勞工或合作的報紙，那是這兩種團體很容易表同意的；不過有些別的事情將牠們的注意力佔據了，牠們認爲那些事情是更爲急切的；並且這兩種團體也和其餘的各種組織一樣，對於平民精神和辦事的效果率之關係還是不很明白的。

爲造成那必須的實行的意志起見，說明實行的必要和實行之有成功的希望當然有一部分效力；而特別提醒那些易致失敗的錯誤當然是避免失敗的一部分方法。作者著這部小小的書便是爲的這兩件事了。